

目 录

新研究(原《连云港论坛》, 曾名《研究》)

2016\02 (总第 200 期)



荟萃理论精品
鼓励争鸣探讨
繁荣社科事业
谋求转型发展

《新研究》编委会

主 任: 杨东升

副 主 任: 张建民 明 磊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万军 孙巨传 刘晓春

刘宏光 朱伟哲 陈留生

陈兴发 张克勤 张淑萍

张荣富 朱其训 杨雪英

周一云 骆汝九 徐爱玲

徐正华 钱 进 黄忠德

舒小平 臧 雷 霍卫群

领导与社科

强化三个引领 推动改革发展 滕 雯 (03)

经济建设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推进中国的经贸强国战略 马 涛 (06)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及中韩跨境电子商务的战略机会 秦良娟 (14)

立足“加减乘除”促进工业提升 刘开山等 (18)

国外经济转型升级的经验启示 史 丹 江飞涛 (22)

社会建设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及解决思路 程同顺 (25)

医院文化管理对医务人员组织承诺的影响探讨 李 婷 (31)

生态文明建设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 于法稳 (33)

论新常态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黄治东 (35)

文化建设

浅析儒学复兴与现代文明 刘泽华 (39)

糜竺兄妹历史资源开发探究 张名艾 (42)

传播学与艺术学

融文化观照与文献考辨于一体的一部力作
——评伏涤修著《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 张文德 (45)

关于改进体育传播的思考 古丽给娜·赛买提 (48)

主管：中共连云港市委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主办：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他山之石

| | |
|--------------------------------|--------------|
| 论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改革重点 行走的“读书梦” | 王 健 (50) |
| ——从“书香园区”看如何建设城市软实力 | 苏 雁 王 阳 (55) |

社科动态

| | |
|---|----------|
| 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规则 | (56) |
| 关于设立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七届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通知 | (57) |
| 关于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兼职 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工作分工的通知 | (58) |
| 《新研究》礼赞 ——写在总 200 期刊发庆典时的回顾与展望 | 王统余 (59) |
| 写在本刊出刊 200 期之际 | (60) |

社科大事记

(61)

本期赠阅范围：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监委领导；县、区党政负责人，市、县区各部门负责人；乡镇党政负责人；市重点工商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行业协会负责人；市重点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负责人。
市社联所属社会科学团体；社科教学教研人员。
中国社科院、省及各省辖市社联、社科院；全国 300 家大中城市社联、100 家社科杂志社；省内部分高等院校。
全国报刊数据交换处理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CALIS) 数字图书馆；市图书馆、阅览室。

主 编：明 磊
副主编：周一云
责任编辑：王兰舟 刘怀君

编辑出版：《新研究》编辑部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封面设计制作：周一云 陈亚蒙

地 址：连云港市朝阳东路 69 号
(市行政中心大楼 338 室)
网 址：<http://sk.lyg.gov.cn>
电子邮箱：lygsk1@126.COM
电 话：0518-85825781
传 真：0518-85825582
邮 编：222006
准印证号：JS—G016 号

强化三个引领 推动改革发展

滕 雯

2016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对“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站在大的形势和背景下思考和谋划,找准服务全市中心工作的方向和坐标,强化思想、价值和文化引领,推动全市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强化思想引领,着力深化理论武装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也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职责。现在意识形态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根子上讲都是认识的问题、思想的问题。面对思想理论领域的复杂形势,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理论武装工作,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好地凝聚思想共识,否则就是舍本求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一是抓好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都是在充分把握时局基础上形成的深邃思考,不仅讲得精彩生动,而且充满了大智慧,代表了党和国家的大方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要以看齐意识持续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教育引向深入,着力抓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宣传活动,坚持用广覆盖提高学习的参与度,用多形式强化活动的渗入度,用抓结合增强工作的契合度。要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取向,在全市开展“理论、理想、理性”三理专题学习活动,推动党员干部不断深化理论武装,强化理想

信念,理性看待社会思潮。要积极探索“理论+”宣讲模式,开通运营连云港“理论快递”微信公众号,及时掌握“微友”关注热点,打造具有连云港特色和较高用户粘合度的理论平台。要着眼拉近科学理论与普通百姓的距离,创新话语表达体系,开展“讲身边故事、评民间名嘴”等活动,用民间舆论发出主流声音。

二是抓好“关键少数”。党委(党组)中心组是推动理论武装工作的重要载体。今年要以中央即将出台的党委中心组学习规则为依据,以“四定学习法”为标杆,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和领导干部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的主题主线,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切实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要深入开展“坚持四个全面、落实五大理念”专题读书调研等活动,举办中心组秘书及理论骨干培训班,创建一批学习示范点,不断健全学习通报制度,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提高学习质量。

三是抓好新型智库建设。思想因时代而兴,理论为国家而强,社科理论研究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支撑。要加快推进社科强市建设,以重点社科项目立项、优秀社科成果评奖为杠杆,加强事关全市发展重大课题的应用性研究,把重心进一步转移到为全市改革发展服务上来。今年,要加强沟通衔接,争取与上海共同发起召开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社科工作联席会议;加

强与国家、省社科院和驻连高校的合作,争取联合设立研究基地;实施社科项目“双百工程”,组织社科研究立项100项,评选有份量的优秀研究成果100项;首次编写出版《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执政实录》;实施优秀理论成果编撰工程,编写《连云港市首届十大社科名家文库丛书》、《连云港智库(2016)》等一批社科专项著作。

二、强化价值引领,着力汇聚精神力量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和全过程的主线。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的要求和省文明委“五年行动方案”的部署,以最能形成共识的“爱敬诚善”为着力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推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一是把加强宣传教育作为基本手段。要创新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形式,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三百”工程(建设100个核心价值观示范基地、征集100个基层核心价值观经验做法汇编成册,评选100名践行核心价值观榜样),不断提升公益广告制作刊播数量质量,拓展用好道德讲堂、婆婆妈妈大舞台、百家训·润港城等载体,使核心价值观每天见报、见屏、见网,形成“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宣传效果。近期,中宣部将在江苏召开全国“最美家庭”巡讲经验交流会,连云港的实践得到中宣部的肯定,将在大会上作交流发言。围绕塑造城市精神,今年将实施“连云港城市形象创塑行动”,推选影响连云港历史的十大人物(十大乡贤),开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东方大港”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主题征文等活动。

二是把构建示范群体作为突出任务。要以“美·德照亮港城”品牌为引领,成立道德风尚建设基金,定期举办“美·德照亮港城”颁奖晚会,让美德和善行在连云港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社会基础。要抓住重点路段、公共场所,在市革命纪念馆打造“美·德照亮港城”展示区,在苍梧路上打造“港城先锋”示范路,在陇海步行街打造港城“叶欣仁”主题园,在公交系统推广“敬老文明线”,在BRT沿线站台建立“好人相伴、一路同行”道德楷模风采展示区,不断强化“街头正能量”。

要发挥先进典型“一盏灯照亮一大片”、“一滴水折射太阳光辉”的示范带动效应,在各行各业大力选树“最美港城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港城叶欣仁”等,在榜样的感召下努力形成群星璀璨、榜样迭出、争当先进的生动局面。

三是把深化文明实践作为主攻方向。要以“诚信港城”为主题,将诚信渗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大力营造“诚信最美”的社会氛围,联合市有关部门开展“十大政务诚信机关”、“十大诚信商场(街)”、“十大诚信企业”、“十大诚信电商品牌”等评选活动,完善“红黑榜”定期发布制度,在主流媒体推出《诚信港城启示录》专栏,使“诚信”成为城市发展的坚强基石。要以“友善港城”为主题,实施“大爱连云港”工程,推出“每周善点”、“善行港城,边走边听”等电视、广播节目,用好“志愿连云港”一网一端平台,以“与雷锋车同行、共建美德(友善)港城”为年度主题开展志愿服务行动,建设100个志愿服务示范站点,让公益行动“汇小流成江海”,使“友善”成为城市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引导向善要从小培养,鼓励中小学把“日行一善”等理念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之中,依托小记者中心打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育苗”基地,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响以“万名小学生进军营”、“万名小记者寻找身边的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直通车”为主要内容的“两万一通”品牌。通过推动“诚信”和“友善”在全社会的践行,让连云港人更加守信、更有温度、更有情怀,使连云港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较高显示度的人文之城、文明之地。

三、强化文化引领,着力推动改革发展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也是决定一座城市品味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文化就像一个城市的“精气神”,城市有了文化,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力。今年是推进文艺繁荣发展、加快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一年,要坚持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同步提升,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业”并举,加快建设富有独特魅力和创造活力的文化强市。

一是文艺繁荣要抓好精品创作。文艺是世界语言,最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文艺精品是一个

时代的文明标识和艺术丰碑,也是一个地方的城市名片和精神视窗。一个地方只有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有灵气、有底气,才能吸引更多有理想的人加入。文艺也是民族精神的火炬,要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全市文艺界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开展“我喜爱的文艺工作者”评选活动,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更具港城韵味的文艺精品。要强化对文艺创作生产的政策引导,出台花果山文化奖评选办法、优秀文艺成果奖励办法以及振兴戏曲等系列配套文件,加大市内原创优秀剧目的巡演补贴力度,今年新排剧目淮海戏《辣妈犟爸》、京剧《九月菊》将赴全市乡镇巡演。要抓好精品创作重点工程项目,完成纪录片《徐福》制作并在央视播出,同步推出《徐福外传》连环画在日、韩两国发行,制作播出广播剧《东方大港梦》,打造“一带一路”文艺的“连云港景观”。要加强文艺品牌建设,巩固提升西游记文化节、文化艺术展示季、戏剧节、动漫作品大赛、“追梦路上”微电影展播、“经典·悦读”、连云港读书节等品牌活动。

二是公共文化服务要增强效能。以创建国家、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目标,以扩面增量、提升效能为重点,创建一批省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县(区)、乡镇(街道),加快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全覆盖。编制实施《城区公共文体设施布局规划》,深入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以群众文化需求为导向,广泛开展全民阅读、广场文化、“三下乡”、高雅艺术进校园进社区等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的公益文化活动。

三是文化产业要加快发展步伐。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是文化影响力的基础和支撑。要加强文化产业区域布局规划,抓好各县区文化产业集聚园区建设,加快推进新世界文化城、星海湖文创园、连云港众创谷、东海水晶融合发展试验区等一批实力强、规模大的重点文化项目,对深圳文化科技产业项目推介会签约的14个重点项目进行跟踪督办,推动引进落地。要深入实施文化企业“十百千”工程,做大做强十家重点文化企业,

助力提升百家规模文化企业,促进发展千家小微文化企业,努力推动形成“大块头”与小企业竞相发展、比翼齐飞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发展要有大格局、新思维,着眼于全方位、全社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大力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体育、创意和设计服务等产业融合发展。

四是文化改革要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是文化领域改革的特殊要求,直接关系到文化体制改革的走向和成效。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里关于国有文化企业“两个效益”相统一的相关意见,在宏观上重点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考核评价机制,推动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宣传部门有效主导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构,在微观上着力推动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政策和制度上确保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要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强化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服务功能,推动国有文化企业规范运营,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完善文化体制改革协调机制,建立提升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发展水平联席会议制度,逐步建立重大事项汇报对接制度、专项政策制定统筹协调制度、重大问题专家咨询制度,进一步增强文化改革发展工作合力。

(作者系中共连云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 推进中国的经贸强国战略

马 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国际分工体系日趋细化，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交织并存，基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的专业化分工也越来越盛行，中国正是借助各种形式的加工贸易参与垂直生产网络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中国在较长时期内主要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也承接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外包的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环节，通过各种形式的加工组装再出口大量更加复杂、更加差异化，甚至技术含量较高的机械和电子类制成品。例如，2010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46.9%，同时，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55%。此外，中国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走出去”，也为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创造了外部条件。总之，这种生产格局和贸易投资模式早已使中国在跨境交易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经贸大国。几十年来，中国在本土技术积累和贸易利得的提升上都取得了质的飞跃，也正努力向着制造强国和经贸强国迈进。

一、发展制造业不仅稳固中国经济实力，也是加强对外经贸联系的基础

金融危机后，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发

展战略考虑，美国政府提出要“重返制造业”，德国政府也推出了“工业4.0”战略。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此时，中国提出制造业强国战略也正逢其时，这折射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对于各国而言都至关重要。《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利用这十年的时间，使中国迈入制造强国的行列。由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不仅能缩短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差距，也能巩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到那时，不仅制造强国的地位已经稳固，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也会显著提升。在此过程中，要特别发展高端制造业，这将是打造中国成为制造强国和经贸强国的重点领域。

制造大国只能创造经贸大国，制造强国才能缔造经贸强国。随着中国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也不断提升。客观地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如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还存在着较大差距：第一，由于参与全球分工地位不同，中国制造业多数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也就是增加值较低的生产、组装等环节。而增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则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据着，这是导致中国制

制造业增加值率低的根本原因。第二,中国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第三,中国工业品的制造品质和增加值相对偏低,与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等世界制造强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上述国家能造什么,中国也能造什么,但是内涵在制成品中的人力资本等要素含量相差还较大。第四,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的差距较大。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中国必须考虑如何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和贸易体系。一个产业或者企业融入价值链当中,不仅为了获得任务贸易,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促进产品的价值增值和产业升级,这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和经贸实力的外部条件。如何有效发展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实力,需要从内部条件下功夫,最主要的是创新,无论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还是模式创新等。技术创新是进行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最直接途径。发展模式创新,是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思路的创新。加快发展模式创新,有利于推动经济和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在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只有同步推动开放型经济和创新型经济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才能真正实现经贸强国。

如何看待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制造业高端要素创造的贡献(增加值)在不断提升,这种提升不仅包括要素技术含量的提高,也蕴含着创新驱动的加强。从微观层面看,高科技企业创新动力十足,也有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这是有许多深层次原因的,包括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和对创新失误的鼓励和支持机制等。所以,中国政府要特别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的构建,这些企业多数是由年轻的创业者创办,而且多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创意企业等,这些企业更需要用创新发展推动。政府要想方设法给这些企业创新支持,不管是政策支持,还是资金支持,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

中国制造业要立足世界,从政策支撑层面看,首先,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创新型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其次,提升制造业的知识资本,关键要对各种技能劳动力进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这是实现产业内要素升级的基

础条件;再次,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这也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实现经贸强国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加强区域经济互联,通过价值链合作拓展经贸联系

全球价值链纵贯互联的各经济体,是促使这些经济体紧密联系的纽带。全球价值链能促进更多经济体的更多生产要素溶于同一生产活动,从而促进国际投资和贸易,形成互联经济体,为互联经济体更快增长提供机会。例如,从产业层面分析 APEC 成员参与 GVC 的程度和成员之间的产业关联,显得非常必要。这种经济互联可以通过考察成员的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加以实现。前向关联是指一国将本国增加值出口到其他国家并作为其他国家对外出口的一部分增加值。后向关联是指一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增加值部分。

我们利用 OECD/WTO 数据库提供的 2009 年数据加以分析。首先对某种重要产业的后向关联最为显著的国家进行排序,然后再分解外国增加值部分的主要来源国的占比情况。

我们首先分析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皮革和制鞋业的情况。表 1 是 APEC 的 19 个成员中纺织服装、皮革和制鞋业出口中外国增加值(FVA)的排序,以及各自前十位来源国占比的情况。其中,表中的 FVA 一行数据为实际外国增加值额,中国在 19 个成员中 FVA 值最大,其次是越南、泰国、韩国等国家。由于中国纺织服装、皮革和制鞋业的出口体量最大,也导致出口中内涵的外国增加值最大,2009 年高达 420.3 亿美元。另一方面,尽管中国该行业出口的外国增加值巨大,但是外国增加值的来源国份额却均占比较小,美国为 2.81%,其次日本为 2.49%,再次韩国为 1.41%,这也说明中国从外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国别分布较广,即使份额小,但是绝对值较大。

位于东南亚的越南 2009 年纺织服装、皮革和制鞋业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仅次于中国,达 87.7 亿美元。越南出口中的进口中间品有 13.49%来自中国,7.32%来自韩国,6.22%来自日本,说明其外国增加值主要集中于东亚国家和地区。这说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纺织服装、皮革和制鞋业

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中国已成为全球很多国家该行业的主要供应商。同时,中国该产业的国内增加值份额(DVAS)也高达 79.29%,不仅产量大,而且增值份额也很高。

相比上述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再选择一个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分析,这里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进行对比。表 2 则是 APEC 的 19 个成员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中的 FVA 的排序,以及各自前十位来源国占比的构成及具体情况。

从外国进口来源国看,美国和日本是 APEC 成员交通运输制造业的主要进口来源国,或者说是进口量来源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和德国则属于

“下一梯队”的进口来源国。中国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角色也不可小觑。在出口外国增加值较高的国家中,来自中国的增加值份额会排在第二、三的位置,例如美国、日本和墨西哥的出口 FVA 来自中国的份额排在第二位,在 1.81%~2.68%之间,仅次于美国或者日本的份额;又例如韩国、泰国、中国台湾等的出口 FVA 来自中国的份额则排在第三位,在 3%~4.4%之间,还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份额占比。由此可见,中国在亚太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出口构成中也有相当大的增加值份额,说明随着中国知识资本的不断积累,中国也逐渐融入到高技术密集产业的跨国生产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 1. 纺织服装、皮革和鞋制造业在 APEC 成员出口中 FVA 排序和主要来源国占比(2009 年)

| | 中国 | 越南 | 泰国 | 韩国 | 印尼 | 中国台湾 | 美国 | 墨西哥 | 马来西亚 | 加拿大 | 日本 | 菲律宾 |
|---------|-----------|-----------|-----------|-----------|-----------|-----------|----------|----------|-----------|----------|-----------|-----------|
| FVA 亿美元 | 420.3 | 87.7 | 43.4 | 38.5 | 26.4 | 23.2 | 23.1 | 16.8 | 13.6 | 7.6 | 7 | 6.3 |
| 1 | 美国 2.81 | 中国 13.49 | 中国 3.24 | 中国 5.64 | 中国 4.63 | 日本 6.15 | 中国 2.22 | 美国 12.84 | 中国 4.48 | 美国 9.7 | 中国 3.62 | 美国 5.29 |
| 2 | 日本 2.49 | 韩国 7.32 | 日本 3.18 | 美国 4.06 | 韩国 2.92 | 美国 4.59 | 加拿大 1.59 | 中国 1.64 | 美国 4.19 | 中国 2.75 | 美国 1.68 | 中国 3.49 |
| 3 | 韩国 1.41 | 日本 6.22 | 美国 2.85 | 日本 2.97 | 美国 1.93 | 中国 3.6 | 日本 1.12 | 加拿大 0.74 | 日本 3.58 | 意大利 0.81 | 沙特 0.57 | 日本 2.05 |
| 4 | 巴西 0.95 | 中国台湾 5.29 | 沙特 1.05 | 沙特 1.84 | 日本 1.56 | 沙特 2.38 | 墨西哥 1.07 | 德国 0.71 | 泰国 2.68 | 德国 0.72 | 韩国 0.55 | 韩国 1.99 |
| 5 | 中国台湾 0.94 | 美国 4.41 | 澳大利亚 0.92 | 澳大利亚 1.28 | 中国台湾 1.26 | 德国 1.13 | 德国 0.87 | 日本 0.61 | 新加坡 1.96 | 韩国 0.69 | 澳大利亚 0.52 | 中国台湾 1.61 |
| 6 | 德国 0.92 | 泰国 2.06 | 德国 0.9 | 印尼 1.22 | 新加坡 1.03 | 韩国 1.13 | 韩国 0.74 | 韩国 0.49 | 印尼 1.83 | 印度 0.67 | 德国 0.48 | 越南 1.01 |
| 7 | 澳大利亚 0.77 | 德国 2.02 | 巴西 0.84 | 德国 1.1 | 沙特 0.97 | 澳大利亚 1.12 | 英国 0.72 | 意大利 0.47 | 中国台湾 1.65 | 日本 0.63 | 印尼 0.48 | 印尼 0.95 |
| 8 | 沙特 0.61 | 俄罗斯 1.52 | 韩国 0.79 | 印度 1.08 | 马来西亚 0.75 | 印尼 1.1 | 印度 0.64 | 英国 0.3 | 印度 1.45 | 英国 0.58 | 意大利 0.42 | 泰国 0.9 |
| 9 | 印度 0.59 | 印度 1.46 | 中国台湾 0.77 | 意大利 0.78 | 中国香港 0.71 | 印度 0.75 | 意大利 0.62 | 巴西 0.26 | 韩国 1.22 | 墨西哥 0.55 | 泰国 0.37 | 中国香港 0.84 |
| 10 | 意大利 0.58 | 中国香港 1.44 | 印尼 0.74 | 俄罗斯 0.73 | 德国 0.68 | 俄罗斯 0.67 | 爱尔兰 0.48 | 法国 0.25 | 德国 1.21 | 法国 0.34 | 中国台湾 0.32 | 德国 0.81 |
| DVAS | 79.29 | 37.38 | 74.37 | 68.13 | 75.65 | 66.93 | 82 | 77.11 | 62.09 | 76.46 | 86.14 | 70.59 |

数据来源:OECD GVC Indicators 数据库获得并经过整理得到。

注:表中其它 APEC 成员的外国增加值较小而未进行来源国的数据分解,表中暂未统计。(下表同)

表 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 APEC 成员出口中 FVA 排序和主要来源国占比 (2009 年)

| | 韩国 | 美国 | 日本 | 加拿大 | 中国 | 墨西哥 | 新加坡 | 中国台湾 | 泰国 | 俄罗斯 | 澳大利亚 | 马来西亚 | 印尼 |
|---------|-----------|-----------|-----------|-----------|-----------|-----------|-----------|-----------|-----------|-----------|----------|-----------|-----------|
| FVA 亿美元 | 266.9 | 252.9 | 189.8 | 177.7 | 171.1 | 153.5 | 31.8 | 27.6 | 26.1 | 9.7 | 8.1 | 7.1 | 6.3 |
| 1 | 日本 6.75 | 日本 2.45 | 美国 2.53 | 美国 19.61 | 日本 6.95 | 美国 15.88 | 美国 18.37 | 日本 9.67 | 日本 14.15 | 德国 3.32 | 美国 3.51 | 美国 7.5 | 日本 2.99 |
| 2 | 美国 4.78 | 中国 1.83 | 中国 1.82 | 日本 2.37 | 美国 4 | 中国 2.68 | 日本 3.34 | 美国 5.6 | 美国 3.93 | 韩国 1.74 | 日本 2.08 | 日本 6.57 | 美国 2.39 |
| 3 | 中国 4.4 | 加拿大 1.43 | 韩国 0.73 | 英国 1.73 | 德国 3.28 | 日本 2.39 | 中国 2.2 | 中国 4.29 | 中国 3 | 日本 1.51 | 中国 1.79 | 中国 3.22 | 中国 1.71 |
| 4 | 德国 2.21 | 德国 1.26 | 德国 0.68 | 中国 1.56 | 韩国 2.64 | 德国 2.2 | 德国 2.18 | 沙特 1.32 | 德国 1.65 | 美国 1.44 | 德国 1.24 | 泰国 2.4 | 新加坡 1.34 |
| 5 | 沙特 1.59 | 墨西哥 1.22 | 澳大利亚 0.64 | 墨西哥 1.4 | 法国 0.99 | 韩国 1.35 | 英国 1.51 | 德国 1.15 | 印尼 1.48 | 意大利 0.91 | 泰国 1.01 | 德国 2.37 | 泰国 1.16 |
| 6 | 澳大利亚 1.43 | 法国 0.88 | 沙特 0.63 | 德国 1.26 | 澳大利亚 0.97 | 加拿大 1.11 | 法国 1.34 | 韩国 1.09 | 韩国 1.46 | 中国 0.89 | 英国 0.81 | 韩国 1.97 | 德国 0.62 |
| 7 | 俄罗斯 1.12 | 韩国 0.79 | 印尼 0.52 | 韩国 0.76 | 中国台湾 0.85 | 中国台湾 0.58 | 马来西亚 1.34 | 澳大利亚 1.05 | 英国 1.43 | 斯洛伐克 0.87 | 韩国 0.72 | 印尼 1.81 | 马来西亚 0.6 |
| 8 | 法国 0.8 | 英国 0.69 | 中国台湾 0.44 | 法国 0.62 | 英国 0.82 | 英国 0.49 | 印尼 0.97 | 俄罗斯 0.86 | 马来西亚 1.24 | 捷克 0.79 | 新加坡 0.65 | 澳大利亚 1.66 | 韩国 0.55 |
| 9 | 意大利 0.69 | 意大利 0.51 | 英国 0.38 | 意大利 0.51 | 俄罗斯 0.77 | 意大利 0.48 | 印度 0.85 | 印尼 0.8 | 澳大利亚 1.19 | 法国 0.76 | 法国 0.52 | 新加坡 1.66 | 澳大利亚 0.48 |
| 10 | 印尼 0.68 | 中国台湾 0.51 | 泰国 0.37 | 中国台湾 0.33 | 意大利 0.72 | 法国 0.42 | 韩国 0.84 | 法国 0.54 | 瑞士 1.12 | 英国 0.48 | 意大利 0.5 | 英国 1.4 | 中国台湾 0.38 |
| DVAS | 63.51 | 82.95 | 85.85 | 63.99 | 66.52 | 66.55 | 55.59 | 64.72 | 55.14 | 79.32 | 79.86 | 52.64 | 82.88 |

从亚太经济互联的视角看中国在产业价值链比较优势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产业转移升级给其他亚太经济体分得“一杯羹”,因为这些经济体需要这样的机会,以此获得经济发展和经济赶超的机会。另一方面,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和超越。这正是得益于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不仅加强了区域经济互联,也提升了中国经贸质量。

三、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升了经贸质量,也是经贸强国的基础

全球价值链自身的发展和变化体现的是各国在价值链上位置或者经济结构的变动。对于国

家而言,提升本国的全球化水平不仅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关键是把全球价值链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各国需要清楚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这里有两个判断因素:一是国家经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 and 国内价值创造能力;二是国家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技术层面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如图 1 中所示,国家产业(或者企业)从资源密集型活动到低、中、高技术制造服务活动,再到高附加值的知识型创造活动等,表现出生产活动的结构升级。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则是从一体化融入到不同层面的升级过程,整个价值链呈现“梯级”发展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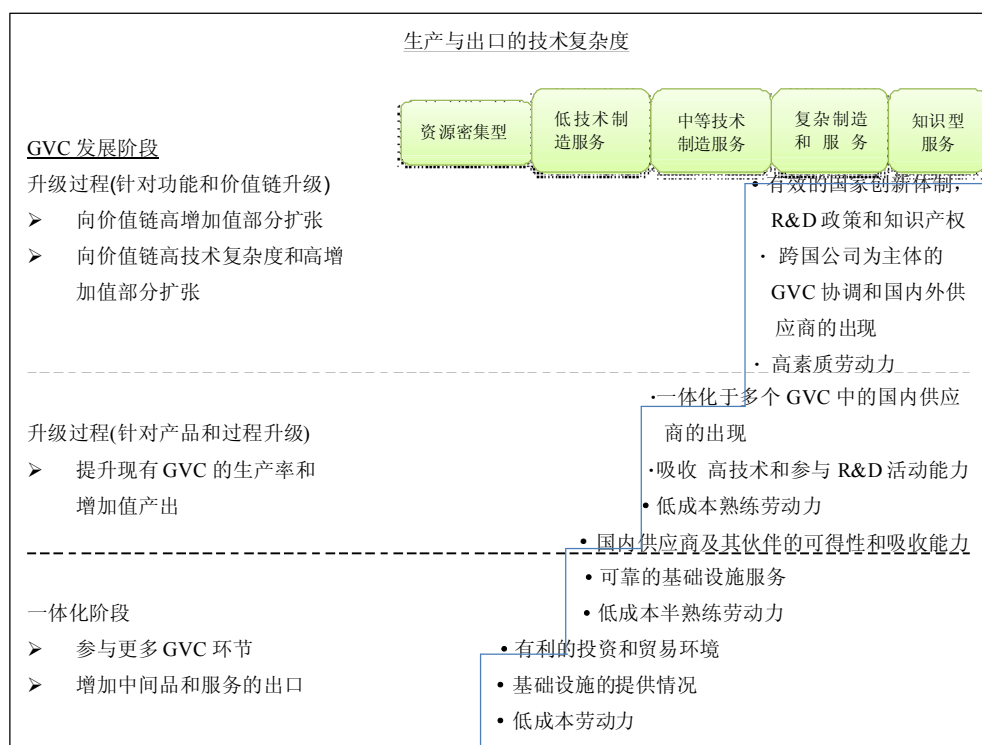
对于只能依赖资源型经济的国家而言,全球

价值链的发展战略通过提高参与分割化的价值链、扩大多样化程度、同时增加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获得提高。上述的生产和出口只是位于低技术复杂度的价值链末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实现。这种模式虽然参与了多条价值链，但都是低端环节的加工制造，所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很低。资源型国家全球价值链发展可以通过吸收外国投资来发展加工制造业，逐步提高国内增加值，从资源比较优势向规模经济跨越。

即使拥有技术的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

平和层次也不尽相同。这些国家不断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关键在于，提升产品和加工水平，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值创造能力，以此向价值链技术更高、更复杂的环节发展。可见，国家既要一体化于全球价值链，还要在价值链中获得升级，就必须利用国内要素禀赋和条件，在价值链上获得成功发展路径。参与全球价值链不仅是国家获的经济发展的必要选择，同时也是贸易和投资全球化的重要途径。

图 1.全球价值链梯级发展的要素和条件



资料来源: UNCTAD

产业的不断跃升，不仅提高了贸易产品品质，外贸企业吸引外资的质量也会得到提升。产业如何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跃升，从微观角度看，产业投入中包含的高端生产要素比重越来越大，如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创造的产出增加值提高。例如，1995 年和 2008 年中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各种生产要素对产业增加值的贡献份额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其中，产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创造

的增加值份额由 1.3%提高至 3.3%。从要素构成看，发生了明显的产业升级。

对于外贸企业亦是如此，企业的转型升级就是向价值链两端增值率高的环节延伸。中国制造业向高技术生产环节攀升，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增加值也会提高，诸如这样的外贸企业吸收的外资自然会投资在这些高端制造生产环节。从要素构成看，高端生产环节需要投入高端生产要素，

外资也相应投在高端要素上面。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当产业或者产品沿着价值链升级,必定会提高经贸产品质量,经贸质量的跃升是中国迈向经贸强国的微观基础。

四、努力转变贸易模式,迈向经贸强国之路

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经贸不仅获得了较大发展,还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随着经贸实力的增强,中国产业(或者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也会发生变化,生产格局的变化也会导致贸易模式转变。未来时期,中国提出要努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在价值链中均处于增值较高的环节,特别是商业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都在“微笑曲线”的两端。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垂直型”的生产共享型模式。全球产品内分工使得处在价值链中下游的中国承接了大量中低端的生产任务,“贴牌生产”(OEM)模式也使中国一跃成为贸易大国,并冠名以“世界工厂”。随着中国生产技术积累和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中国开始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ODM”(自主设计生产)和“EMS”(电子制造服务)模式也随之涌现。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也促使中国贸易模式根据“任务贸易”形式而变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贸易模式转变。

中国企业技术的进步和“走出去”战略已实施多年,很多企业正在闯出一条产品、技术、服务“全产业链出口”之路。在这种背景下,部分产业或者产品可以构建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s),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即生产独享型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丰富要素禀赋和各种比较优势,构建完整的全产业价值链。当然,这种模式与封闭经济下的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模式完全不同,这是技术进步积累到一定阶段,并且各种生产要素获得充分发展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更具竞争优势的新型模式。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转型,更多体现在中国制造业部门参与全球化分工下比较优势的转变,尤其是出口结构的提升,从

而实现更加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现在亟需转变贸易模式,继续实施出口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政策,适度调控一些高排放产业的出口规模。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是今后中国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从制造与出口“两高一资”产品获得粗放型增长,到代工和贴牌生产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加工贸易产品,再到实现“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产品的不断扩大,生产和贸易结构出现巨大提升。国家需要通过技术、管理、创新等多轮驱动获得国际竞争新优势,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促使中国企业朝着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方向发展,进而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多的福利。

贸易模式的转变必然会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经贸强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中国各地区经贸的协调、均衡发展。伴随着中国各地区资源结构和技术的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贸易模式也要随之变化。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包括出口企业)也不可能完全向海外转出去,有一部分会向中国中西部省份转移。另外,外商在华投资成本也不断上升,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转移。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是渐进式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转变。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也势必会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这种渐进式的结构优化过程,终极目标是把中国的对外经贸做大、做强,从而实现经贸强国战略。

五、实现全球价值链下经贸强国战略,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为了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不仅应该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体系,还要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积极扮演制定者的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且主导着国际经贸的发展方向。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很大程度都会遵循国际经贸规则,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经贸新规则层出不穷,也制约着一些国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应该加速促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战略,尽快与国际经贸新规则接轨,并逐步适应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为尽早

实现经贸强国战略铺平道路。

区域贸易协定将有助于成员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为扩大全球价值链效应,成员国共同参与区域生产体系下的区域贸易协定更为有效。当前,全球形成了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东西两大格局。近日,参加 TPP 谈判的 12 个国家基本达成协议,TPP 的谈成,将会主导亚太地区的经贸发展格局。亚太地区的价值链发展最为活跃,也势必会受到 TPP 协定的影响。TTIP 旨在重塑全球贸易新秩序,虽然只有美欧两大阵营,其自由贸易协定的规模也不可小觑,毕竟欧盟 28 个成员国的 GDP 占到全球近 50%。无论是 TPP 还是 TTIP 都是美国主导的多重区域一体化安排,在 多边贸易规则难以向前推进的背景下,其转而着力推行区域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美欧借此一方面另辟蹊径以重新获得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以高水平、高标准的区域安排给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设置高准入门槛,削弱其话语权。当前,正在紧锣密鼓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TTIP 以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等,还有国内加快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都需要中国积极参与或者勇于应对新的贸易投资规则。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力推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一旦相关国家达成协议,可能会对协议以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例如,纺织服装产业的原产地规则,假设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签订了该产业的原产地规则,而把中国排斥在外的话,将会对中国该产业造成极大的利益损害。原产地规则可能从政策上阻碍一些国家某些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造成这些国家某些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重新调整。例如,TPP 若实施较为严格的原产地规则的话,将会对一些国家的某些产业造成深刻影响。TPP 成员国之间的出口将会获得更多针对原产地而设定的优惠政策,也会扩大成员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反而会伤害非成员经济体的产业利益。

另外,在服务贸易方面,已有近 50 个国家参与了覆盖全球约 70%服务贸易额的新服务贸易

协定(TISA)谈判。该谈判旨在更新 WTO 框架下服务贸易相关的规则,实现高水平的自由化并吸纳广泛的参与者,最终演进为多边协定。中美 BIT 谈判继续推进,中国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承诺将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纵观上述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都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中国不仅不能独善其身,而且越来越多的经贸规则与中国的关系重大,中国必须积极的应对,这样才能争取其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当今,全球经贸发展乏善可陈,区域经贸合作错综复杂,国际经贸规则层出不穷,提升经贸实力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贸强国战略的实现。当前,区域贸易发展较为强劲,区域贸易格局直接影响多边和诸边贸易的发展,所以,中国应该参加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并积极参与各项经贸规则的制定。未来中国对外贸易如何发展、怎样转型都与国际经贸新规则息息相关。这就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谈判,了解新规则、新标准,结合中国经贸强国战略,该追赶的追赶,该积极应对的积极应对。

六、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全球价值链下经贸强国的重要机遇,也给连云港市带来了宝贵的发展契机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中国与一些沿线国家签署了有关合作备忘录,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相互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众所周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重在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正如习主席今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未来十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突破 2.5 万亿美元,较现在的规模翻一番还多。

同时,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较强,沿线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也受到沿线国家的青睐,出口规模也增长较快。从主要进口来源地看,中国从东南亚国家进口的比重普遍比较大,例如从马来西亚、

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进口份额都在6%以上。中国从中东国家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的进口份额也在6%–11%左右,这一定程度上和这些国家都是石油输出国有关。此外,中国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进口份额为3%以上,从俄罗斯进口份额也高达9%左右。从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份额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说明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更为紧密。与进口占比情况相似的是,中国对沿线贸易伙伴出口份额较高的国家与进口国家基本吻合,特别是,中国对波兰和土耳其的出口也占到了2%–4%左右,较为显著。中国对新加坡、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的出口份额较高,比重都超过了6%。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中国与沿线国家将有更多的支持政策和措施出台,加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贸易投资环境的进一步开放透明,这些都将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扩大提供基础保障。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互联互通,也会提高中国贸易增长率,高端领域的经贸合作还能促进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一带一路”战略也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拓宽了思路、指明了新方向。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空间,也是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升级的一个新区域方向。中国在亚太地区,产业链优势和嵌入程度已经基本固定,进一步提升价值链的空间有限。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提升价值链的空间的更大。所以,中国应该大力构建与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不断壮大自身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实力。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可以带动中国富裕产能和资金“走出去”,也有利于中国产业的优化升级,还可以加强同沿线国家产业价值链的构建,促进产业间的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具有较大的互补性,根据这种特点,中国可以加大与沿线国家产业链方面

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价值链。产业价值链的构建最主要的是扩大了双边经贸联系,在数量上促进中国的经贸规模、在质量上提升中国的经贸品质。从价值链的合作看,沿线国家能提供中国一些稀缺的资源 and 资金,而这些生产要素恰好可以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发展,成为中国实现经贸强国的一个重要发展机遇。

此外,“一带一路”战略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给其起点城市——连云港带来宝贵的发展契机。首先,通过扩大对外经济开放,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连云港可以进一步加强和日本佐贺市、韩国木浦市等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发展。其次,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还可以为连云港同沿线国家和地区搭建合作的平台。该平台能够凸显连云港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比较优势,加强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互补,促进连云港市的产能消化,打造领域更加广阔的价值链合作。最后,连云港市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为“经贸强市”创造条件,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添砖加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及中韩跨境电子商务的战略机会

秦良娟

近些年,随着中国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出现了蓬勃的发展。2014年,我国电子商务总体交易规模突破了13万亿,同比增长31%。其中,企业间的B2B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为10.2万亿,同比增长33%,面向最终用户的网络零售市场规模为2.82万亿,同比增长速度为49.7%。此外,大宗商品交易、移动电商、跨境电商等领域也发展迅速。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在终端市场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新空间和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同时通过与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产业的融合,推动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催生了各种创新的商业模式。

为了能进一步促进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2015年5月4日,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国发〔2015〕24号),其目标是到2020年,在中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安全可靠的电子商务生态环境。2015年6月10日,国务院审议通过《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优化通关流程、落实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货物退免

税政策、鼓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通关、仓储、融资等服务、鼓励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企业通过海外仓、体验店等拓展营销渠道,培育自有品牌和自建平台。

商务部、工信部、发改委、海关总署等部门,也在国务院《指导意见》的指导下,相继出台电商及跨境电商的支持政策,逐步加快了各项工作的落地实施。各大行业联盟及协会也通过召集全国范围内的电商大会,探索中国电商发展方向及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特点问题,以期促进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本文将在总结我国电子商务领域创新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韩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机会及建议。

一、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创新发展状况

我国电子商务的创新发展状况呈现出以下特点:在高度方面,已成为国家战略,企业转型升级的抓手;广度方面,已覆盖到经济全局,发挥出引领作用;在深度方面:已由经济活动浅层转入更难更深环节,速度方面,仍然保持着不低于30%的快速增长势头。

电子商务形成了一个不断发展和状态的产业,包括交易服务业、支撑服务业(例如物流、结

算和支付、电子认证)、衍生服务业(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增值服务、金融服务)等。

1、B2B 领域风生水起,厚积薄发

近几年,中国的各大传统企业纷纷加入电子商务行列,以其强大的资源背景优势参与到向电商转型的进程中。传统企业实施电商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供应链运作效率和面向市场的个性化服务能力。

他们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从产品、服务、商务流程、商业模式等诸多领域展开协同创新。一些具有实体业务基础的企业,开始将其自用的电子商务系统,逐步向第三方平台转变,发展成为行业级垂直电商平台,或者面向一个区域的骨干电商平台。同时,在电子商务平台的支撑下,将供应链金融服务与企业供应链运作结合。

2、B2C 市场持续火爆,创新活力十足

在中国的 B2C 市场,目前已经形成了三个梯队的市场格局。第一梯队主要是天猫、京东;第二梯队:苏宁易购、唯品会、国美在线、亚马逊中国等。第三梯队:酒仙网、寺库中国、我买网、顺丰优选等行业垂直电商。在销售规模前十的电商中除 1 号店意外均已上市,58 同城、去哪儿网、500 彩票网等相继完成 IPO;酒仙网和美团等在已经在筹划密谋上市的进程中。

B2C 领域的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企业开始深度应用大数据和移动技术去发现新的用户需求,并通过各种技术来提高用户的粘性。此外,因为 B2C 面向终端消费者,如何建立线上和线下模式的结合来改善用户体验,也是 B2C 企业比较关心的问题。

3、移动应用逐渐成熟,成为新一轮增长点

2014 年,我国移动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9285 亿元,而 2013 年为 2731 亿元,同比增长 240%。随着 4G 网络商用、智能手机普及和移动购物、移动支付等条件的完善,我国的移动电子商务逐步走向成熟,成为新一轮的增长点。微商崛起、虚拟社区购物、去中心化等特点,成为移动电商领域热议的课题。

4、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同质化竞争激烈资源整合已成趋势

我国大宗商品现货电子商务平台 100 余家,其中以第三方为主的较有影响涉钢平台 30 余家,交易额达数百亿元以上的平台不足 10 家。其他还有化工、煤炭、建筑材料等细分的行业平台。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主体血统分为钢厂、贸易商、IT 商。电子商务平台交易模式主要为垂直式、第二方、第三方、混合式等。

5、涉农成为新的蓝海,但是电商平台经营惨淡

涉农电商交易平台目前统计共有 4000 多家,交易额约占农产品总流通量的 2%。目前,涉农电商平台 1%实现盈利、4%持平、88%略亏、7%巨亏。

造成农业电商亏损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在与:农产品运输过程中损耗率高,约占 10%以上;仓储和运输成本大,一些地区缺乏冷链物流。农产品的产品非标准化程度高,农产品质量不易控制;农产品的生产链和销售链条长;用户的重复购买率低。

6、跨境电商潜力无限

自 2014 年底海关总署开始跨境电商城市的试点,跨境电商领域开始了飞速的发展。2014 年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超过 5000 家,总交易额达 3.75 万亿,同比增长 39%;其中,进口额 4763 亿,增长 59%;出口额 3.27 万亿,增长 36%。在跨境电商的业务额中,跨境零售总额为 4492 亿,增长 44%;其中跨境进口 1290 亿,增长 60%,跨境出口 3202 亿,增长 40%。

跨境电商企业关心的普遍问题是:海外 O2O 展示、国际营销渠道的设计与开拓、海外仓、海外直采以及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

通过对各电商领域的总结,可以看出如下创新特征:首先,我国产业电子商务已经全面崛起,行业电子商务开始集中发力。其次,在一些三线城市,区域电子商务实现跨界融合。涉农电子商务尽管眼前存在困难,但一些先进企业正在进行有益的尝试,有望在该领域实现突破。再次,跨境

电商涌现龙头骨干,他们在 B2B、B2C、进口、出口以及外贸综合服务领域,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的作用,促进这着国际贸易监管与服务流程的创新。此外,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驱动了我国电商领域的集成创新。

二、中韩发展跨境电商的机会分析

1、中国为全国供应商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2015 年 6 月 11 日,埃森哲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未来几年内全球 B2C 电商市场将保持接近 15%的年均增速,2020 年全球跨境 B2C 电商交易额将达到 9940 亿美元(约合 6.17 万亿元人民币),惠及 9.43 亿全球消费者。2014-2020 全球跨境 B2C 市场保持 27%的增长。跨境 B2C 电商将把中国的消费品进口额的年均增速拉高 4%百分点。由于全球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诸多差异,各区域市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发展轨迹。到 2020 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 B2C 消费市场。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为海外供应商带来的机会。

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高端消费品的市场,为各国优秀的供应商进入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2、中国政府在海关监管与服务方面的改进,以促进贸易的便利化

中国政府在跨境电商监管与服务模式方面付出了诸多的努力,自 2013 年开始,通过十个试点城市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来不断推进中国贸易便利化的进程,希望中国及海外的企业提供更高效率的进出口的服务。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我国跨境电商进口的增长速度达到了 60%。

3、中韩地缘及政治上的合作具有扎实的基础

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由于文化及地缘的接近,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受到两国的高度重视。2015 年 6 月,中国正式与韩国签署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其目的是,通过提高通关的效率、降低关税、优化和降低物流成本等措施,促进中韩两国贸易的增长。中韩之间区位优势相邻,几乎每天都有韩国与中国几个城市之间的班轮,例如上海、天津、秦皇岛、大连、丹东、青

岛、烟台、威海、日照和连云港的海上航线。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2015 年 10 月 31-11 月 2 日,国家总理李克强访问韩国,中国商务部与韩国外交部签署了《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联合规划纲要(2016-2020)》、《中国商务部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关于在自贸区框架下开展产业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商务部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关于在自贸区框架下研究成立中韩投资合作基金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与韩国企划财政部和产业通商资源部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四个合作文件,双方将在信息通信、交通物流、金融、卫生保健、能源、环保产业、文化产业、制造业、农渔业九个合作潜能巨大的产业领域展开合作。此外,双方还将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政策领域进行合作与协调。

三、中韩企业开展跨境贸易面临的核心问题

上述合作框架的为中韩贸易及跨境电商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然而,在实际合作中,两国在政策方面、两国企业合作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1、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研究和开拓能力的不足

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首先需要了解别国消费者需求及采购行为特点的差异。其次,要建立和推广产品在海外的品牌。其三,很多企业希望通过海外仓的建设来优化整体物流的运作,在提高到货速度的同时,降低仓储的成本及风险,但是如何选择合作伙伴并对海外仓进行管理,则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其四,海外市场的售后服务及客户关系管理。其五、中小企业的跨境贸易中,由于海外应收帐款帐期过长、海外备货的资金占用等问题,需要贸易融资的服务。

2、在缺少相互信任的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风险

在跨境支付与结算过程中:信用证诈骗、线下商品装箱造假、海外备货的货物保管等风险无处不在,如何解决两国卖家和卖家之间信任缺失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建立第三方的跨境支付与结

算，以及地三方的信用管理可能是有效路径之一。

四、中国在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方面的现状和经验

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跨境电子商务进口还是跨境电商出口，中国都已经出现很多的企业，可以支撑跨境电商的物流、第三方支付与结算、电子认证、贸易融资等服务。其中最典型的是，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已经得到国家的认可。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是将进出口业务中的各个环节的服务，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平台，然后由平台企业投放给中小外贸企业，其主要服务项目包括通关、退税、物流、保险、融资等。

中国政府在大力推进通关一体化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出台了一些列鼓励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型企业发展的政策：以阿里巴巴一达通为代表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现并快速发展。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平台的搭建，为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便利（商业机会、成本、时间、手续、融资、市场信息），延续中国制造的优势，同时带动其他服务业发展（物流、仓储、保险、结算、融资、数据、信用服务等）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具备以下特点：单一窗口、不参与任何交易、只提供综合服务（外贸流程管理、报关、退税、融资、数据、咨询，以及连接第三方认证等）、平台数据交换、平台数据传输标准转换、国际或国内平台的对接和合作、准公共服务平台。

五、建立中韩合作的在线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必要性

首先，中韩跨境贸易快速增长需要高效的、建立在信息化平台基础上的外贸服务的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完成通关、物流、结汇、出口退税的基础服务；

其二，需要建立中韩在线的第三方的跨境支付与结算系统；

其三，需要建立中韩跨境电商的基础数据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价与管理系统；

其四，需要建立中韩跨境电商线上与线下结合的风险识别与防范体系；

其五，需要建立中韩跨境贸易的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

六、结论

对于跨境电子商务的理解，需要从交易向服务转变。中韩两国跨境电商企业有需要通力合作，建立线上和线下结合的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为两国的中小企业提供跨境贸易中一系列的服务：例如，通关、跨境支付与结算、国际物流以及供应链金融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两国首先需要在相关的贸易政策上作出切合实际的设计，在不危害到两国利益及企业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提高两国进出口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来促进两国国际经济和贸易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立足“加减乘除”促进工业提升

刘开山 杨立州 董月方 刘红亮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工业发展,大力实施“产业强市、工业立市”战略,始终把推动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强市、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新的要求,从供给侧的角度把握全市工业发展现状,找准问题症结,探索契合我市实际的工业发展路径,是实现我市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全市工业发展现状

供给侧改革主要解决的是供需错配的问题,就工业来讲,核心就是通过调结构、转动力、化产能,实现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改善供给品质,满足新的需求,最终实现工业产能的总供给与市场总需要之间的均衡。分析我市工业发展现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重点产业“供给”情况总体趋好。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工业经济扩量提质,201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5574.55亿元,增长13.2%;工业增加值达到1156.50亿元,增长12.9%;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石化、冶金等六大重点产业产值占全市80%左右,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体系。新医药产业建成了国内抗肿瘤药物、抗肝炎药物、麻醉手术药物、新型中成药、新型药用包装材料、医用消毒灭菌设备六大生产基地,是国内最大的抗肿瘤药物、抗肝炎药物研发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现代中药、药用复合包装材料研发生产基

地。新材料产业形成以无机非金属材料、高性能纤维为主的特色产业体系,是国内最大环氧模塑料生产基地,环氧模塑料系列产品、硅微粉、石英玻璃管、石英玻璃原料产量占全国80%以上,压电石英晶体产量占全国60%以上;在碳纤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差别化氨纶纤维等领域技术水平国内领先。装备制造产业形成了风电装备、汽车及零部件、专用装备和船舶修造等为主导的产业体系。石化产业形成了以石化、盐化、农化、生物化工、化工新材料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冶金产业拥有镇鑫特钢、兴鑫钢铁、亚新钢铁等企业,钢铁产能达到1250万吨。

(二)重点行业“过剩”问题基本可控。国家明确提出“去产能”的四个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我市只有钢铁、水泥、平板玻璃三个行业,没有电解铝。其中,钢铁企业3家,产能全部获得国家有关部门行业准入,主要产品都为棒材和线材等建筑用钢,镇鑫集团具有部分特钢产能,由于我市钢铁企业占有物流成本优势,在全行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还能实现盈利,去产能的压力相对较小,在一定意义上说还有内地沿江减量搬迁对接发展的机会。平板玻璃。只有东海台玻1家企业,生产能力为800万重量箱特种玻璃,不在过剩产能范围。2015年产能基本开足,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近5000万。水泥产业共有企业9家,由于山东小水泥低端产品,以及安徽海螺、山东泉头等水泥集团低价冲击,目前企业生产开工率明显下降,企业经营状况不好,但是由于我市水泥行业

企业总数较少、产能总量较低,对全市去产能影响不大。

(三)转型发展“短板”问题需要重视。虽然我市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竞争能力不断增强,重点行业的去产能压力不大,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制约着产业发展步伐。一是传统产业比重较高。目前工业产业结构中,石化、冶金、建材、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产值占比仍超过 50%,并且大部分企业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科技含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产业带动性较弱。二是工业增加值率偏低。“十二五”时期,随着鑫鑫特钢、亚新钢铁、虹港石化等重化工企业纷纷投产达产,有力地拉动了全市工业经济快速增长,但是高耗能的重化工企业也降低了全市的工业增加值率。三是部分行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产业层次低的影响,钢铁、建材、船舶等产业均受不同程度冲击。四是大型骨干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全市缺乏带动作用强的龙头型、旗舰型大型骨干企业,百亿级龙头企业主要以石化、钢铁企业为主,企业均两头在外,产业链短,对产业的集聚和带动能力仍然偏弱。

二、全市工业发展制约因素

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供给品质、扩大有效供给、培育新的动能等要求,我市工业发展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一是工业投资不足。近年来,全市工业投资增速较快,但总体规模偏小,2015 年,全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投资 1265.6 亿元,全省第三,但总量仅占全省 5.6%,位居全省倒数第二,仅比宿迁(1224 亿元)多 41.6 亿元,这反映了我市工业基础仍然相对薄弱,在建项目数量和体量支撑不足。从投资的产业结构看,全市传统产业总投资占全市工业投资比例达 70%,产业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调整。

二是创新能力不强。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仅占工业企业的 10%左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除新医药、新材料、装备制造业等少数龙头企业创新能力较强外,企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新产品开发投入不足,大多数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不高,产品升级换代缓慢,研发创新型项目匮乏,全市智能装备制造企业不足 10 家。社会科技投资不足,全市实际开展创业投资的企业不足 5 家,科技担保、科技保险的机构缺乏,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三是企业成本偏高。用工成本高,服装、电子、化工等企业出现用工缺口,特别是高端人才、高技术熟练工人短缺,企业为员工缴纳各种保险的支出已占企业工资总额 40%以上,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综合融资利率高于企业平均利润率,企业内在发展动力不足。

四是信息化应用不广。我市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现代信息技术应用重视不够,缺乏既熟悉工业化又精通信息化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普遍具有明显的相机而动的行为特征,企业发展到哪个阶段就建哪个模块的信息化系统,缺乏前期统一的规划设计,导致信息模块相互分散,“信息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信息系统的合力。

三、全市工业供给侧改革的几点设想

针对我市工业发展实际,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要求,做好全市工业发展,建议做好“加减乘除”四篇文章。

(一)做好“加法”,狠抓新的经济增长点

抓出一批增长点,既是连云港调结构的重要推动力,也是稳增长的关键。为此,我市应认真贯彻落实省“双百工程”决策部署,从新上项目、技术改造、优化服务三个方面着手,扩大工业有效投入。

一是在项目投入上做“加法”,迅速做大做强增量。按照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的路子,加快引进大项目、集聚大产业。各个县区板块按照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围绕重点龙头项目的引进,加快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构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实施工业项目“双百工程”,重点抓好 100 项投资 2 亿元以上的重点工业建设项目、100 项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对排定的市、县两级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实行“单月跟踪分析、双月督查通报、半年现场观摩、年终考核评比”推进机制,进一步完善领导挂钩帮办、难题集中会办、重点项目跟踪服务等机制,切实提高项目如期竣工率、投产达效率,尽快形成经济增量。

二是在技术改造上做“加法”,逐步转化存量。重点鼓励企业采用先进设备和工艺,发展先进产能,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和贡献率。在全市开展规模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排查摸底,掌握正在实施和将要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建立单体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技术改

造项目库,市县(区)联动、跟踪服务,推进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扶持力度,用足用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专项资金的导向作用,建立“合同管理”机制,变“事后奖励补助”为“事前激励引导”,调动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三是在扶优培强上做“加法”,着力做强总量。针对不同企业、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研究落实“一企一策”帮扶措施,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共生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科研院所、专业机构,为企业战略规划、技术创新、装备升级等提供零距离服务,寻找薄弱环节,找准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成长壮大。对全市行业龙头企业进行专项摸底调查,集中政策、资源和服务,对重点企业进行叠加扶持,推动成长期中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成熟期大企业提高竞争实力。实施中小微企业“小进规、小升高、小转精”专项行动,引导企业专业化生产和精细化服务,打造一批“单打冠军”和“科技小巨人”企业,力争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0家以上,过10亿企业数量达到70家,过百亿企业数量达到7家。

(二)做好“减法”,有效整合盘活资源

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过剩产能,有效盘活整合资源,具体做到“清、退、停、组”。

“清”,就是有效清理闲置资源。对“僵尸企业”进行排查摸底,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里统一部署,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积极稳妥进行处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闲置土地、闲置厂房等闲置资源集中清理,并依法处置和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着力盘活存量土地,实现粗放型用地方式向集约型用地方式的转变,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建立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的新机制,努力缓解我市用地紧张状况,促进我市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退”,就是推动低效产能退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水泥行业重点引导企业进行生产设施改造,淘汰能耗大、技术等级低的生产装备,新上节能环保的生产设施。加快淘汰两灌地区老旧小化工企业,提高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水平,重点发展高端染料及中间体、石化关联产业等。依托我市盐化产业资源优势,拓展盐化产业链,加快推进连云港碱厂技改搬迁和氯化法钛白粉项目,同

时与石化产业相结合,积极发展油脂化工、化工新材料等,构建上下游相互衔接、低成本、高效率的循环产业体系。

“停”,就是坚决停止审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新增产能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类产业,符合产业规划,重点围绕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新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大力引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核心项目、延长产业链条关键性项目以及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的骨干性项目,严禁引入淘汰类产业项目和国家产能严重过剩项目。

“组”,就是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加大企业兼并重组力度,制定出台《关于鼓励和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强化政策引导,抓大放小、扶优汰劣,鼓励支持重点骨干企业整合行业资源,实现资源优化整合。钢铁行业通过产能的重组整合,加强与业内企业的相互配套合作,延伸产业链。同时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开展产需对接活动,争取在我市建筑工程中扩大市场份额,树立良好的市场品牌形象。船舶行业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支持改善产品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发展中小特种船舶,构建船舶修造产业链。

(三)做好“乘法”,全面推动创新驱动

全面推进科技、金融、人才等创新,最大程度地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

一是推动科技创新,增强“源动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和产业。实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瞄准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大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制定发布技术创新路线图,整合创新资源,组织联合攻关,在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一批重要产业创新成果,加快转化应用。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支持企业建立各类研发中心,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组建企业创新服务平台,整合各类社会化服务资源,为企业创新创业提供技术指导、融资担保、人才培养、市场开拓、信息支撑等服务,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积极推动“地所合作”,依托716所等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引导本市企业在智能

装备、医疗器械、矿用装备、工程装备、信息系统等方面与716所等进行合作,实施一批重点攻关项目,力争建立中船产业园或杰瑞产业园。

二是推动模式创新,增强“牵引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落实关键举措,明确行动路线,推动企业产品高端化、生产智能化、模式绿色化。落实《“中国制造2025”连云港行动纲要》,出台《连云港市推进智能制造行动计划》,加快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创新,促进信息技术集成创新与协同应用,鼓励企业开展数控化装备升级换代、现有装备数字化改造、关键岗位机器人应用,逐步建立面向生产全流程、管理全方位、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制造模式,培育智能制造示范车间,加快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实施工业机器人应用计划,通过事后奖励、设备租赁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推动企业在装备升级方面实现新突破。引导企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支持制造业企业以电子商务为手段,革新品牌推广、营销方式、支付结算、售后服务等环节,提高供应链协同水平,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三是推动金融创新,增强“撬动力”。推动基金投资扩大盘子。充分发挥市工业发展基金撬动作用,以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建,撬动各类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产业投资,扩大工业发展基金规模,以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相结合的模式,为创业投资者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利用商标质押、股权质押、众筹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通过中小企业私募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等方式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体系,为制造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推出个性化金融产品,建立有效贷款需求信息定期沟通制度,满足制造企业多种金融需求。建立金融运行联络交流制度和金融风险快速协调处理机制,提高经营主体对风险管理的预判力和处置力。制定《连云港市中小企业应急转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首期规模2亿元中小企业应急转贷资金,扩大担保基金规模,防止和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抓住IPO注册制改革的机遇,重点推动支持一批科技含量高、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在主板、“新三板”及江苏股权交易中心等资本市场挂牌。

四是引进创新人才,增强“聚合能力”。创新驱

动本质是人才驱动。瞄准产业发展和企业实际需求,大力培养和引进一批创新创业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发挥好淮海工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等本地院校作用,创新培训机制,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人才支撑。用好用活现有人才,探索建立与贡献相匹配的创新收益机制,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政策环境,充分释放创新人才的智慧资源和创新潜能。

(四)做好“除法”,着力优化发展环境

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

一是简政放权除“壁垒”。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全面落实“5张清单、1个平台、7项相关改革”等举措,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试点,清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最大限度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努力推动政府管理从行政型向法治化转变,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消除民间资本依法进入相关领域的各种隐性壁垒。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严厉惩处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侵权行为。

二是深化改革除“成本”。按照中央、省部署有序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研究重点行业营改增对我市相关产业经济产生的影响,加快二三产业融合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实各项结构性减税政策,清理规范行政审批前置服务及收费行为,公开涉企收费清单,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创新投入方式,完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扶持政策,支持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产业提升、园区建设。推进政、银、企三方合作,搭建中小微企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扶持帮助中小微企业发展,积极培育和发展税源经济。

三是鼓励双创除“顾虑”。大力气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全社会营造一种鼓励创业、鼓励致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加大对成功的创业者的表彰力度和宣传报道。建议设立“大众创业奖”,表彰、奖励一些有特殊贡献的创业者,并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等扶持。全面放开创业领域,凡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向各类创业主体开放。同时,创新管理方式,变事前监管为事中事后监管,正确区分对待创业创新行业与投机性行业。积极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提高违法成本,营造宽松公平的创新创业氛围。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委研究室联合调研组)

国外经济转型升级的经验启示

史 丹 江飞涛

日本、新加坡、德国等国家都曾经历经济转型升级过程，它们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在推动国民生产体系质量与效率提升、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方面富有成效，成为持续增强国家竞争能力的重要举措。它们的经验对于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让“用质量去竞争”成为国民共识

日本和新加坡通过国民运动转变国民观念，让企业、国民充分认识到持续改善生产效率与质量的高度重要性，并成功地让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参与到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活动中来。“日本制造”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缺乏国际竞争力。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把“质量救国”作为国家战略，在全国范围推广全面质量管理。日本科学技术联盟设立质量管理研究小组，创立质量管理月等制度，迅速提升了质量水平。“质量救国”战略保证了日本 1960 至 1970 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最终促使其工业竞争力超过美欧。日本沿着质量强国道路继续前行，1999 年颁布《制造基础技术振兴基本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公共团体、生产经营者在促进生产基础技术方面的职责。一些日本企业提出了持续改善效率和质量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和具体做法。此外，产业专家、管理研究者、企业家、管理者、各阶层员工都积极参加到持续改善效率和质量的活动中，这些理念和思想深入人心。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新加坡劳动力市场紧缺，工资水平上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面临严峻挑战，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新加坡领导人认识到本国生产力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决定发起全国性的生产力运动，并在国家和公司层面全面开展。新加坡还仿效日本把每年 11 月定为“生产力月”。通过生产力运动，新加坡政府向每个国民灌输发展生产力（提升生产体系的效率与质量）的理念，让各阶层国民充分认识到提升效率与质量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发展生产力的活动中来。30 余年来，新加坡政府始终通过宣传和教育，向国民强调提升效率与质量对国家和提升国民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提升生产力又成为新加坡国家战略的优先选项。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因冒仿英法美等国产品并以廉价冲击市场，使“德国制造”成为一种歧视性标签。德国工业界开始反思，并严格质量管理，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质量认证”体系。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例如《设备安全法》《产品安全法》《食品法》等，范围广泛的法律体系成为德国产品质量的根本保证。二是统一行业标准。德国标准化学会制定的标准覆盖几乎所有工业领域，保证产品品质和性能的稳定性。三是客观的认证体系。质量认证机构既保证了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又向消费者证明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到 19 世

纪末期,“德国制造”基本扭转了在世人心目中的负面印象。20世纪50年代,德国实施“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国策,制造业在二战后迅速崛起。“用质量去竞争”逐渐成为大多数德国企业的座右铭,很快“德国制造”成为品质和信誉的代名词。在德国,对于技术、效率、品质近乎苛刻的追求,早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德国制造”的灵魂。

设置专门机构助推生产力提升

为帮助企业甚至公共部门持续提升效率与质量,日本与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特定机构。在日本,持续改善生产效率与质量逐渐成为企业的自发行动,同时得到日本科学技术联盟、日本生产力中心与日本管理协会这3个非营利组织的帮助。它们为企业提供课程、研讨、咨询、国际交流、设立生产力与质量奖项以及其它支持机制,这些活动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资助。

新加坡先后成立生产力中心和生产力促进委员会,二者在生产力运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围绕生产效率与质量提升这个核心领域,组织技术专家、管理专家、企业管理人员、工人等各阶层人士展开研究,总结先进企业经验,为企业提升生产率提供课程培训、论坛和研讨会、参观学习先进企业、提供技术与管理咨询甚至解决方案,极大促进了不同机构与个人参与到活动中来,并推动了先进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研究、应用和传播。生产力促进委员会除上述职能外,还与亚洲生产力组织、日本海外技术研修者协会就提升生产率与工作技能培训等领域展开合作,并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作发起“生产力发展计划”。这些国际合作为新加坡提升生产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虽然没有设立专门助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机构,但官方性质的德国技术转移中心、半官方性质的弗朗霍夫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从技术方面助推企业效率与质量提升的功能;德国的工业协会、商会则为企业提供政策、科技、管理等方面咨询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用。

帮助中小企业增强技术能力

日本政府在二战后初期就开始实施中小企业评价系统工程,并为此成立中小企业诊断协

会。评价系统是经国家授权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企业诊断与咨询服务、改善建议的系统,其目标是提升中小企业的效率与能力。中小企业大学是评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严格培训中小企业咨询师,并对合格者予以认证,合格者获取中小企业大学的认证后,会自动获得通产省(后改为经产省)颁发的企业咨询师证书与相应从业资格。中小企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企业评价系统诊断与咨询服务的高质量。2004年,日本将几个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组织合并成中小型企业 and 区域创新组织,并于2006年对评价系统优化,更突出评价系统的实际应用性。日本的企业评价系统经过多年有效实施,对提升中小企业生产效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生产率也是新加坡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政策的执行需要政府与商会和商业协会合作。新加坡众多商会和商业协会中有5个企业发展中心,里面有许多商业顾问可以给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包括寻找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扶持项目,帮助中小企业寻求融资,为其提供公司管理、生产管理、人力资源、公司运转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新加坡生产率中心则为中小企业提高生产率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及相应经营管理方面的建议。

德国政府同样重视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德国技术转移中心和弗朗霍夫学会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技术、产品开发方面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提升技术能力、效率与产品质量以及新产品开发。政府还通过补贴方式鼓励中小企业接受专业技术、创新及相应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以便让企业更好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不断加快的技术更新速度。

建设科工院校与职业教育网

日本、新加坡、德国都高度重视产业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并将此作为推动国民经济体系效率提升与生产力水平跃升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其成效显著。这三个国家一方面重视高水平科技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的建设,为国民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的科技、工程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极为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建立员工终身学习体系。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高度重视高水平科

技大学的建设,这些科技大学为日本培养了不少高素质科技人才,为日本产业发展与效率提升做出重要贡献。新加坡同样致力于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世界顶尖的科技大学之一,为本国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提升培养了很多具有国际水准的科技、管理人才;而 1992 年成立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也为国家建设输送了一批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

德国历来重视高水平理工大学的建设,9 所理工大学形成的理工大学联盟历史悠久且享有国际盛名。20 世纪 60 年代,联邦德国经济进入飞跃发展阶段,社会需要大量实用型高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联邦及州政府为顺应这一要求,大力发展应用科技大学。应用科技大学面向市场,根据经济发展与产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设立理论与实践交叉循环的课程体系,企业密切参与教育过程,其毕业生由于良好的专业素质与丰富的实践经验非常受企业欢迎。德国 70% 的工程师都毕业于应用科技大学。

这三个国家不但高度重视尖端科技人才、精英型技术人才的培养,还特别重视职业技术、技能的教育与培训,强调技术技能培训内容与目标产业劳动需求的匹配,强调培训项目及内容的设置应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变迁过程中对劳动技能要求的变化而及时调整。

比如,日本制定《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并建立以学校职业教育、公共职业教育与企业职业教育为主要构成的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其教育体系结构既有初、中、高各种层次衔接,又有国、公、私各种类型,使日本形成了较密集、高效的“职教网”,进而有效提升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质量与效率。高效优质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与持续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

德国制定了《联邦职业教育法》,建立起著名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即企业与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培养技能人才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双轨制”教育体系将职业实践的学习与专业知识、普通文化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出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成为德国制造业效率与质量持续提升的重要源泉,也是德国制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构成。

在新加坡,全国人力资源委员会根据国家中长期人力资源的规划和需求,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与策略,明确量化目标,在 4—5 年时间内,根据学生类型、数量和特定技能要求,由各大学和理工学院进行培养。同时,政府资金将按照职业教育培训计划与人力资源规划给予支持。在继续教育方面,政府通过提供一系列多元的技能培训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使培训范围扩大到所有层次员工的职业技能和竞争力。

构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日本制造逐渐成为高质量产品的代表。这一成果得益于两股重要力量推动:一是持续改善理念、思想及先进经验的成熟和推广;二是日本政府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构建完善的、严格保护消费者权益制度体系。许多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日本实施的严格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包括集团诉讼、具有震慑力的惩罚性赔款、生产方举证责任、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等),对于倒逼日本企业持续提升产品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国则全方位严格保护消费者权益。首先,从法律上制定了《消费者保护法》《食品法》《日用品法》《产品担保法》和《消费信贷法》,条款规定非常详尽。其次,在联邦政府中设立消费者保护部,建立成熟的消费者协会网络,并且有大量独立的产品检验组织。这些法律和机构成为消费者维权最有力的保障,同时迫使企业必须充分保证产品质量,否则会面临严苛的处罚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 及解决思路

程同顺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也仍然大量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治理领域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当前以及未来“十三五”阶段困扰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正确地认识 and 解决当前农村的社会治理问题。农村的社会治理关系到农村地区的生存发展与和谐稳定,也关系到城乡之间的权利平等与公平正义,必须重视和解决。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特殊背景

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特殊阶段,农村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特殊,在较短的历史时期要经历更多的深刻变化。这个特点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背景,决定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内容和特点。具体来说,考察当前农村的社会治理,以下三个方面的背景因素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第一,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之中。当前中国发展最主要的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化,改革开放至今 30 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从 1980 年的 19.39% 提高到了 2015 年的 56.1%, 预计 2020 年还将达到 60%, 这个速度在当前世界排名第一。当前中

国城市化的特点不仅是速度快,而且规模也非常大,涉及全国所有地区的数亿甚至十亿以上人口。当然,这么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化,各级政府无疑起着主导和推动作用,政府主导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

当前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的这个时代特点,对于农村地区客观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村落和社区形态经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大量农村人口外出打工,使农村出现人口庞大的留守群体,社区公共生活缺乏活力,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对于土地和其他农村资源的需要导致出现大量公共利益冲突和突发事件,家庭成员的分离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对于农村传统稳定的婚姻家庭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等。这些影响在客观上制造了当前农村的社会治理问题,对农村社会治理形成了新的困扰和挑战。

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特点虽然不能涵盖农村社会治理的一切问题,但是客观上决定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一些重要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中国的实际特点,我们可以判断,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仍会持续 30~50 年。在这样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中,农村社区形态不断变化,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家

庭分离的状态难以迅速解决,公共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只有当大规模、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趋于平稳之后,当前农村大量的社会治理问题才会趋于减少。

第二,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使现代信息媒介在农村日益大众化。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化信息工具的成本大为降低,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价格已经能够为农村居民所接受,尤其是手机在农村年轻群体中日益普及。截至2015年12月,农村网民在中国网民中占28.4%,规模达1.95亿,较2014年底增加1694万人。农村网民在整体网民中的比例增加,规模增长速度是城镇的2倍。这个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将是未来改变农村文化和农村发展的巨大力量。但是现代化信息工具在农村的大众化既有显著的进步作用,也给农村社会治理增加了新课题。

其积极进步和促进农村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加强亲友之间的感情联系和信息交流,到了解农业生产技术、掌握市场信息,尤其重要的是,现代媒体工具在农村的普及在不远的将来将会使电子商务和网上购物获得高速发展,既可以扩大工业品在农村的销售市场,也可以帮助农民实现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促进城乡经济的互动和交流。

现代信息工具和手段的大众化会对农村的社会治理带来哪些问题呢?一是由于城乡信息的同步,会增加农村居民对于发展的渴望和消费需要的过快增长。当这些渴望和要求在现有发展条件下不能很快得到满足时,就容易使人们产生焦虑和不满情绪,会对政府提出更多更高的公共服务要求,或者在某些事件的刺激下做出过激行为。二是信息工具的大众化容易使负面信息和虚假信息迅速扩散,产生放大效应。农村居民判断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不强,容易互相强化错误或虚假信息。三是会冲击农村家庭的稳定。新媒体对于婚姻家庭的破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四是为农村地区的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

第三,部分半工业化农村地区突然出现的经济衰退。虽然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总体来说是好的,但在全球经济总体下滑和国家对某些产业政策性调整等宏观形势影响下,近几年部分半工

业化的农村地区很多企业由于产业结构老化、产能过剩、效益不佳或污染环境等原因而破产倒闭或关停转产,使这些半工业化地区突然陷入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这会对这些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带来意想不到的难题。一是那些经营不善而破产的企业往往都会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它们突然破产之后便会在当地产生农民工讨薪问题。由于涉及人员较多,往往会给当地基层政府带来很大压力,处理不好就会形成群体性事件。二是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对他们突然遭遇到的下岗失业问题缺乏思想准备,有的也没有其他的工作技能,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就业渠道。三是突然失业下岗会使这些当地农村家庭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突然下降,使他们重新陷入穷困和失望的境地。

虽然这类农村地区在数量和比例上总体不高,但往往都是集中连片的,对当地农村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会给这些农村地区增加很多社会治理难题。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上新世纪以来大量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中国农村取得的进步和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农村的发达程度甚至超过了城市。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结果,农村地区总体的经济水平还不高,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公共服务相对不足,再加上快速城市化、现代信息工具普及化和部分半工业化农村地区的经济衰退等因素,造成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问题还比较多。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不同地区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社会治理问题并不都是同时存在于所有的农村地区。经过不完全归纳总结,当前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公共服务相对短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大幅度提升。截至2015年,中国已经解决了所有农村人口的用电问题,基本实现了道路村村通,目前正在努力实现公交村村通。但由于各级政府确立提供公共服务意识的时间并不长,再加上历史欠账较多,所以目前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总体上仍然

处于不充分的状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历史上国家政策的影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就更加短缺。

虽然从 2006 年起中国已经全部免除了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甚至在有些地区还提供免费午餐和住宿。但是农村中小学的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仍然相对薄弱,难以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有的地区学校分布密度过疏,使得小学生回家和上学的距离过于遥远,既增加了家长的负担,也加大了安全隐患。另外,农村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目前仍然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举办,基本条件和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如果说目前全国医疗资源短缺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在农村地区就更是“缺医少药”了。农村地区县级以下的医院不仅医疗条件和设备短缺,而且一些基本的药品都会不时出现断档的现象,看病难的问题在农村地区仍然突出。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足是个老问题,但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信息手段日益大众化的农村地区,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期望同时却在加速升级。当这种公共服务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农民便会产生失望和焦虑的集体情绪,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治理问题。

第二,社会保障水平不高。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就不断重新编织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安全网,到现在基本上实现了农村社会保障全覆盖。但是这种社会保障全覆盖无疑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并不能帮助那些真正有困难的农民摆脱困境。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合作基金目前主要靠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三方出资,不同地区的政府和经济实力不同的村集体,出资比例大不相同,村民能够享受的报销比例和额度也大不相同。目前各地农村仍然有一些农民在面对巨额医疗费用的时候会选择放弃治疗,看不起病的现象在农村时有发生。看不起病和看病难反映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看病难主要是医疗资源等基本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看不起病主要是由于医疗费用相对农民来说难以负担的问题。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农村地区来说,社会保障在较低水平上的全覆盖只是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简易的防护框架,还不能对于所有农村人口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这就使得一些意外的变

故就可以使一个农民家庭重新陷入困境甚至绝境。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实施精准扶贫,在未来五年使所有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但是如果农村社会保障仍然在低水平上运行的话,这个任务就很难真正实现。

第三,社区建设缺乏支撑。人是社会的动物,社区是个人、家庭在生活居住空间与他人紧密联系所形成的共同体,是个人、家庭与社会联系必不可少的空间和平台。在中国,社区还是城乡居民与国家、政府之间沟通的纽带和桥梁。因此,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当前中国农村的社区建设面临很多困难,缺乏必要的支撑。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农村大量劳动力出外打工使社区建设缺乏必要的主体。《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当年农民工出外打工人数为 2.74 亿,其中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超过 1.68 亿。当前很多地区都有“空心村”现象,大批农民工长期举家外迁,房子、土地长期闲置在农村,青壮年常年在外、村庄常住人口大量减少,难以使农村社区公共生活保持生机和活力。有人估算,在当前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人才流失高达 80% 以上,特别是青壮年流失,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大量的人口外流也使村级组织和村民小组缺乏必要的干部人选,使农村社区面临群龙无首的窘境。受城市化及市场经济的影响,不少年轻有为的村干部也外出务工了,不仅使村级组织出现干部老龄化现象,而且留守村干部对社区建设工作也持消极态度。

其二,社区大规模调整使村民缺乏社区认同意识。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很多地区的农村社区出现大规模调整,不论是撤村并点还是中心村建设,不论是宅基地换房还是“三集中”模式,抑或移民安居工程还是其他各种相关做法,无一不都是打破了原有村庄社区界限进行的重新调整。本来中国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就比较薄弱,现在不少农村社区进行的规模和社区成员的调整,使得他们难以对新社区产生认同感,因而参与社区建设就更难以想象了。

其三,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经费支撑能力有限。社区建设需要一定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动场所和必要的公共设施,以及举办社区活动的经费支持。而很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基层政府自身背负巨额债务,村集体积累又比较薄弱,难以保障必要的经费支持。如即使处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淮安市,直到2012年全市1536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才最终全部实现破零,并且相当数量农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仍然不足十万元。

第四,村官腐败影响恶劣。村干部腐败是个老问题,至今党和政府仍然在探索有效监督村干部的体制机制,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支农惠农项目和财政投入的增多,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村干部腐败的形式在不断花样翻新。除了传统的贪占集体资产、公款消费、以权谋私等形式外,套取侵占国家专项资金、非法转让土地、截留征地补偿款、收受开发商贿赂等新的腐败形式日益增多。一般来说,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中村、城边村,村干部腐败主要集中在拆迁、征地和项目建设上,主要形式为隐瞒信息、侵吞补偿款、收受贿赂等,而在偏远和经济水平一般的农村,村干部腐败多表现为贪污集体财产,侵占和截留惠农补贴、五保金、低保金等项目。

近年来村官巨贪的现象引起了媒体和民众的关注,这实际上是和这些农村拥有土地、矿山和林地等资源有密切关系,这类腐败可以称之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性腐败。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12起案件中,与土地、拆迁相关的有7起,其他案件则涉及安置房、贪污集体资金、国家农资补贴等领域腐败。最近的典型案例有,深圳市龙岗区“村官”周伟思在旧城改造项目中坐地生财,涉嫌受贿5000多万元;北京市高立庄村陈伟杰受贿1625万余元等。村干部腐败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又会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增加农村社会治理难度。最常见的就是导致干群冲突,引发农民上访告状甚至出现群体性事件。如山东省泰安市2013年120批次控告类信访中,农民举报村干部违纪违法的就占了115批次。

第五,留守群体处境堪忧。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给农村留下一个数量庞大的留守群体。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老人约5000万,留守妇女达到5000万,最严重的是留守儿童已经超过6000万。全国妇联于2014年发布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该报告算出目前全国农村有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其中0~14岁年龄段的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60%以上。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要承担主要生产劳动,还要承受与家人分离的精神痛苦,值得关注和关心。

留守儿童遭遇的问题要更加严重,它已经不单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演变为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最近发生的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一个事件特别令人震惊和惋惜,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一家留守儿童四兄妹在2015年6月9日集体服毒自杀,而这并不是个案。儿童尚处于成长发育的阶段,身体、心理、性格、情绪以及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等正处在发育和培养的时期,特别需要父母的教育和培养,以及与父母感情上的互动交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14年5月对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的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遭受意外伤害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学习不良行为较突出;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弱,情感支持欠缺,经常感到烦躁、孤独、闷闷不乐、无缘无故发脾气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很突出,他们生活习惯差,学校表现糟糕,遭受欺负的比例更高,网络不良行为更多,意外伤害更多,对留守生活的负面体验也更高。

第六,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农村的环境问题已具有全新的表现和特点,更加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治理起来难度更大。农村环境问题的表现不仅仅是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包括村庄公共环境卫生的问题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基因污染问题。农村环境问题的污染源,不仅来自生活垃圾和工业生产排放,还有农业污染。农村环境污染造成的破坏,不仅会污染空气和地上水,还会危及地下水和土壤,以及农作物的基因安全。

新农村建设以来,虽然农村的村容街貌大为

改观,但是还有很多地区的农村对于生活垃圾仍然没有很好的处理办法。据测算,全国农村每年有 1.2 亿吨生活垃圾露天堆放,非常影响农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以前人们只关注乡镇企业的工业污染,但是来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同样严重。在养殖业中,有些养殖户滥用激素和抗生素,不仅会产生食品安全问题,而且也污染农村环境。种植业中,农民往往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造成水体和土壤中有毒药物和重金属含量超标。据 2014 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超标率 16.1%,本来就紧缺的耕地超标率为 19.4%。环境问题对农村人口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非常显著,据测算,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已经从 1988 年的 0.0952‰ 上升到 2000 年的 0.1126‰。需要注意的是,不仅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比较可怕,而且由此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也正在逐年增多。更加值得警惕的还有,非法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农村不时突破监管,暗中扩散。

第七,失业问题开始凸显。如前所述,全球经济的衰退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半工业化农村地区的不少企业在最近几年纷纷破产。这些破产的企业又是以煤炭、钢铁和水泥建材等大型企业为主,在当地农村吸收的就业人数往往比较多。企业破产是市场现象,但是破产之后引发的失业问题就成了这些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难题。这些地区往往差不多每家都有人在这些企业上班,而在这些企业上班的农民工往往又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农民工的突然失业就意味着这些农民家庭的经济一下子就失去了收入来源,突然陷入困境。

这些大型企业突然全体失业的农民工所遭受的困境是双重的,既有经济上的困难,更有心理上的挫折感。他们对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和自己收入水平的下降甚至突然失业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为了维持生活水平不致快速下降,重新就业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选择,但是当地的其他企业无法吸收这么多劳动力,他们多数只能外出打工,这就需要他们从长计议,重新安排生活。

总之,这种现象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局部地区有普遍性,会出现大量农民工的集体失业;二

是再就业的困难性,当地无法同时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就业问题。这会使已经失去重要财政来源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经受严峻挑战。

第八,群体性事件多发。快速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发展使各种利益冲突迅速增加,由此在农村地区产生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密集发生。虽然各级政府对农村稳定高度重视,但是在当前中国农村快速发展的特殊背景下,群体性事件,仍然不时发生。透明中国网对各种媒体公开报道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过一列表汇总,指出 2010 年以来发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就多达二十余起。

大体来看,最近几年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其原因主要有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村干部腐败引发的,这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发生的一类群体性事件,可谓历史最悠久;第二类是由征地拆迁及补偿问题引发的,往往会引起暴力抗争甚至流血事件,可谓最激烈的一类群体性事件;第三类是围绕农村环境问题引发的,最近几年数量和比例都不断攀升。

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路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问题是由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中国所处的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所决定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差距较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这决定了农村地区在很长时期内存在民生方面的社会治理困境。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农村也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由发展产生的社会治理难题。中国要想实现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完成城市化的目标,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还需要持续至少 30~50 年。这就意味着中国农村在未来的很长一个时期内仍将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村今后还将会长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困境。今后农村社会治理的完善和突破不能过于理想化,必须符合农村发展的客观实际,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科学稳步地推进。

第一,要依靠发展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与城市相比较,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明显比较薄弱,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很多难题都是由于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低造

成的,这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要面对和承认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个特点决定了只有依靠发展才是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长期战略选择。只有通过发展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才能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只有通过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才能使农民安居乐业;只有发展地方经济,政府才能增加财政收入,才能为农村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才能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农村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了,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提高了,才能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第二,要充分运用既有的组织网络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治理应该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进行。社会治理主体虽然多元广泛,包含基层组织、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但是党委和政府依然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当前农村的社会治理,一定要充分发挥原有的各级党组织、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和民间社会团体的作用,而并非一定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组织和机构。

提到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要充分运用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公共管理,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这个理解有一定的道理,农村社会治理就是要运用多种力量共同解决农村各类问题,但是不能矫枉过正,绕过党和政府,一味寻求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有效的社会治理应该充分运用现有的组织网络,而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建立更多的新机构和新组织上。

第三,要在纵向上区分农村社会治理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当前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都应该重视和解决,但是面对各类不同的问题,在有限的资源制约和时间条件下,我们必须做出区分,确定哪些必须是要尽快解决的,哪些又是在近期解决的,哪些只能在更远的长期才有可能解决。所以,农村社会治理要在时间纵向上有划分阶段意识,要区分长远目标和近期需要突破的重点。当前农村各类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尽管普遍存在,但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迅速解决的,因此可以在解决那些燃眉之急问题的前提下,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分阶段设立目标,分期

分阶段逐步解决。

第四,要在横向上分类处理农村社会治理的不同问题。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除了在纵向上要有分期分阶段意识外,还要在横向上确立分类意识,应该对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各种不同问题进行分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科学分类,不同类型采用不同方案,分别进行处理。如根据社会治理内容的特点,可以将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划分为民生型、冲突型、安全型和政治型等几类;根据社会治理问题发生的频度可以区分为日常型、周期型和偶发型等;根据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又可以分为客观形成型、历史遗留型、人为制造型和体制缺陷型等;根据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又可以分为客观形成型、历史遗留型、人为制造型和体制缺陷型等。

各种民生问题主要属于日常性社会治理工作,要采取治本之策,从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做起。农村村级两委换届主要属于周期性的社会治理工作,应该在换届选举前摸清状况、逐村排查,对于问题村提前做好各方工作和应急预案,将换届产生的矛盾冲突和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农村社会治理的偶发性问题是指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各种生产安全事件、重大交通事故和各种公共安全事件等,可以进行更细的分类研究,确立不同的处理机制。

(作者系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教授)

医院文化管理对医务人员组织承诺的影响探讨

李 婷

随着医改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体制机制矛盾日益凸显,公立医院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改革举措在激活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医务人员的组织承诺。因此,在新医改背景下探讨医院文化管理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医院文化管理与组织承诺

1. 医院文化管理

医院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也存在优秀的、先进的医院文化与落后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宜的医院文化。对于医院而言,优秀的医院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管理”。所谓文化管理,就是充分发挥文化覆盖人的心理、生理、人的现实与历史,把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全面的显示出来,是一整套由一定的集体共享的理想、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形成的,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标准、规范、模式的整合。文化管理能使全体医务人员认同医院所倡导的价值观、理想信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医院的服务意识、服务理念、经营策略等。

2. 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提出,到目前为止,学者对组织

承诺的定义却仍没能统一,但从本质上来说,组织承诺就是一种约束力,即将个体约束到与保持组织成员身份相关的行动上。组织承诺包括:情感承诺(个体对组织的认同程度)、连续承诺(个体为组织连续工作的要求)和规范承诺(社会规范对个体遵从组织程度的影响)。

二、医院文化管理对组织承诺的影响

文化管理最本质的特征是“以人为本”和“以文化人”,前者强调“人”的重要性,后者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简言之,就是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以“人”为中心,并通过“文化”的感染力、道德影响力、价值观感召力使人认同组织的目标、价值观、经营理念,从而建立起牢固的情感承诺,并保持较高的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最终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而相关研究证实情感承诺和离职行为的相关性最强,规范承诺次之,而连续承诺和离职行为的相关性最弱。并且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都与工作绩效正相关,但规范承诺的作用是短暂的,而情感承诺与工作绩效的正相关则相对稳定得多。由此可见,对于医院管理者而言,在医院的日常管理中应做到有目的、有意识、有方法地影响医务人员的情感承诺,这也是维持稳定、提高工作绩效的关键所在。

在国内一些关于企业文化与组织承诺之间

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中,提出诚信导向文化、团队导向文化、成就导向文化和创新导向文化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和情感承诺均有显著影响;在其他关于企业文化相关研究中也证实,对员工的尊重、对成果的注重、团队精神、对细节的注重和稳定的工作环境等方面在情感承诺中起到重要作用。尽管对公立医院研究较少,但以上研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企业文化与组织承诺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医院同样具有推广和可借鉴的价值。

三、加强医院文化管理,提高医务人员组织承诺

医院无论是服务的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以人作为中心。因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并将其渗透到医院的各项工作中。

1. 培养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愿景

相关分析发现,工作价值与组织承诺存在显著正相关。因此,医院管理者应注重医务人员工作价值观的培养,使其与医院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而在建立医院的核心价值观时,应首先明确医院自身作为一个组织存在的目的与意义。在不断发展社会进程中,“救死扶伤、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等应是每个医院,直至每位医务人员永恒不变的价值观,这一点对于变革中的医院尤为重要。因为医院的发展目标,是医院发展的凝聚剂和催化剂,具有鲜明的导向、凝聚和激励作用,所以在以人为本的医院文化建设中,首先应该关注并指导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将医院目标与个人理想有机的结合起来,并为之而奋斗,这将会激发医务人员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医院应通过不断培养全体医务人员认同的价值观与目标来增强员工对其认可度,从而有效提高情感承诺。

2. 完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在医院这个知识性人才密集的地方,员工大多富于思想性,有自己的主见,“自我实现”的需要比较强烈,因此,医院管理者要善于分析,做到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给员工充分的主动权,从而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要求,认真负责,坚持原则抓好管理。但是在管理的过程中也要时时、处处体现“尊

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信任人”的原则,经常深入临床一线,倾听医务人员的意见,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和权利,增强职工主人翁意识,鼓励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参与到医院管理中来。通过构建人本管理体系,使医务人员有意愿、有途径、有方式参与医院的管理与决策,让员工从内心接受医院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潜移默化的将刚性制度转化为一种人性文化,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观念和行为习惯,并自觉地将实现个人发展目标和医院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3. 发挥领导者的重要作用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领导者是一个队其他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人,优秀的领导者应能构造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及信念,并使员工所认同。大量研究也证实,组织中员工与直接领导的关系直接影响员工的组织承诺。试想一个自身以“追求金钱、名利为目标”,以“人都是经济人”为人性理论的人,是不会将医院的价值观放在“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上,也不会以“以人为本”为其管理模式,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那么领导方式也将是集权式、压榨式。因此,医院在选拔及培训领导者的同时,应重视选拔与医院自身价值观、信念、奋斗目标相一致的人,通过自身影响力带领全体职工,充分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在医院文化管理中,要结合医院实际,对关键性的因素加以重视,通过系统的规划、结构调整和制度完善,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和技能的提升,形成具有一定医院特色的风格和文化,凝练共同价值观,打造医院质量、服务、管理品牌,有效激发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塑造医院精神,推进医院文化建设,促进医院的长期稳定与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

于法稳

“十三五”期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充分体现了把全国人民带入全面小康的坚定决心。美丽乡村建设是广大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2013年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发布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系列行动。经过2年多的实践,美丽乡村建设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做一个很好的理解。

广大农村居民是主体

国家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之后,国家各部委积极投入到该项工程之中,都从本系统的业务出发,开展了“自上而下”的项目推动。正是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推向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线,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而真正应成为主体的广大农村居民则游离于美丽乡村建设之外!

从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层面看,每个部门都有其本系统的特定工作。在该系统围绕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自然采取“自上而下”逐级推行,基层职能部门也只能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来实施。为了突出本系统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效,基层职能部门往往倾向于选择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庄作为项目实施点,而真正需要项目的村庄则很难获得支持,正如广大农村居民所讲的,政府选择美丽

乡村试点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愿“雪里送炭”!

从广大农村居民层面看,由于政府职能部门“自上而下”推行的项目与广大农村的实际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错位问题,这也是农民不愿意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之中的主要原因。同时,在广大农村居民看来,政府推行这些项目是在做“政绩工程”,与他们没有关系。

改变这种现象的途径,须由国家各部委“自上而下”的项目推动,转变为广大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让广大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之中,让他们内心认识到,国家真正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是要让广大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同享我国改革的红利,而并非做“政绩工程”。

“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

美丽乡村建设是生活、生态与生产“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硬件设施与软件建设相统一的系统工程。

从生活设施层面看,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民居住条件,通过生态环境治理,美化生态景观无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平原、丘陵、山区等不同地貌类型区域生态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同,因此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容也不可能相同。一个重要原则应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更能突出农村的特点,特别是民族地区更应如此;如果把广大农村都建成高楼大厦,原来的村庄消失了,曾经生活的小院子消失

了,到时乡愁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真正的“梦”。

从生态设施层面看,很多地方都采取粉刷主要干道两侧建筑的墙体,外观确实出现了新面貌;同时,把街道两侧堆放的秸秆、树枝等农村生活燃料集中到偏僻的村中空地上,由此带来这些堆放之处更加脏、乱、差,而且增加了安全风险(如火灾)。因此,这种方式也未得到农村居民的认可。同时,国家环保部、财政部推行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配备了垃圾桶、转运车辆,并建设了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场等,但因缺乏运行经费,导致这些设施被闲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投资的浪费。

从生产设施层面看,美丽乡村建设较多关注生活设施与生态设施的建设,对生产设施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普遍存在水利设施、田间道路设施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的需要。

从软件建设层面看,国家一再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不仅是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统筹,更应是软件方面的统筹,包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在实际运作中,美丽乡村建设对软件的建设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为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应全面统筹生活、生态与生产设施建设,统筹硬件设施建设与软件建设。同时,应关注广大农村居民生活习惯和方式的改变、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建设。

多样化的建设模式

广大农村差异性较大,不可能采取统一的建设模式。但是,我们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农村建设模式几乎一样,即对村内道路、文化广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电、村里路灯等进行改造与建设;对于农村住房改造,多采用“穿衣戴帽”的方式,过多关注外观的统一,未考虑潜在的影响。这种方式一方面会严重影响到乡村民居生活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特别是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一方面投资标准仅考虑了工程项目资金,而且是按照饮水不安全人口确定的,未充分考虑到山区地势地貌、农民居住分散、材料多次转运等特点;另一方面要求地方进行资金配套,以弥补山区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实施中所涉及的征地、项目设计、监理费、青苗补偿、项目建设管理等费用,但山区多为国家扶持开发重点

县,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配套。所有这些都对美丽乡村建设造成一定影响。

为此,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一定要多样化,根据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条件、不同民风民俗,设计不同的建设模式,不要全国一个模式,更重要的是要让广大的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其中,选择最适合的建设模式。

从“项目导向”转向“基层需求导向”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共同推动。国家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之后,各个部门围绕着本系统的工作,推出相应的行动计划,对美丽乡村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因缺乏彼此间的协调机制,部门各自为战,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建设等问题。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美丽乡村建设的组织部门不统一。在国家层面上是由国家农业部负责组织,但基层的组织部门却有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农业工作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政策研究室。不统一的组织部门势必导致国家部门文件下发渠道的不顺畅,监督检查的执行力度不够。因此,为有效解决美丽乡村建设中多部门组织问题,需要进行统一,这样可以畅通驱动,提高效率,更有利于减少实施过程中“争政绩、推责任”现象。

此外,国家相关政策在区域差异方面未给予足够关注,特别是有关资金配套政策,确实给我国老、少、边、穷地区带来很大的负担,影响这些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进度,进而影响到这些地区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笔者建议,在政策的顶层设计上,应从“项目导向”转向“基层需求导向”。建立政策调整机制,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应根据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政策进行及时调整。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部门所推行的行动计划,对项目实施的过程过于关注,但对实施效果关注不够,特别是保持实施效果的机制严重缺失。因此,建议逐步建立农村基础设施与环境管理模式创新机制,克服重建轻管,确保“工程建一处,服务一方群众”的目标;明确管理主体和管理责任,加强对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知识水平和管理技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论新常态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黄治东

一、新常态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1. 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发展现状

生态文明可以通俗地表达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状态,即人与自然成为伙伴关系。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生态文明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践行,其内涵则可简要概括为:完备的生态保障制度,可持续的循环发展模式,前瞻的生态意识,绿色的环保行为。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被重视,并被提升到国家建设的高度,政府也颁布了一些与生态文明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引导全民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努力改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就现实情况而言,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并不理想。例如,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生态问责体系缺乏,国民发展绿色循环经济的思想淡薄,国民忽视所应承担的生态责任……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表明,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成任重道远。

2. 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性

生态文明建设以“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伙伴关系,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人对资源的节约意识,社会

经济的永续发展,绿色环保的生活观念,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的生态保护法规。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特征可以总结为生态制度、生态意识、生态行为三个层次。简单地说,也就是政府要有规范的完善的生态文明体制及生态责任问责制度;国民要有较强的生态文明的观念,有生态责任意识,对生态文明价值观有高度认知,并能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从宏观角度讲,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使让自由观念的延伸,这种在自由观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使让自由,这种使让自由观即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和谐共生,这正是一种与“和谐社会”、“美丽中国”不谋而合的新型生态文明观。

3. 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的意义

“敬畏自然、保护生态”,是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观念,其将自然放在“敬”且“畏”的神学高度上,利于引导国民牢固树立生态平等的生态价值观,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种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观灌输于国民的细胞里,使国民的血管里流淌着这种和谐的观念意识的血液,有利于摆正人与人、人与自然地平等关系,甚至可成为解决国家间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展现我国大国形象的新平台。十八大

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建设格局。其后,习总书记考察各地,都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叮嘱带至各地。可见,生态文明建设被放置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上,且生态文明建设将进入常态化。这种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常态利于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优化,利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的实现。新常态认为青山绿水就是赢得效益的资本,把青山绿水等作为获得财富的资源,这种新型的资源观为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提供了借鉴,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发展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常态却要求“绝不能以破坏环境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种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树立了在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发展经济的新型经济观,为解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问题提供了路径。

二、新常态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

1.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的新常态“历史空前”

上个世纪 70 年代,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就已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把生态环保列为国家工作的重点。目前而言,西方国家的生态问题已不是凸显问题。而我国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才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所用一二百年的发展轨迹,实现了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大跨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个毋庸置疑的奇迹。但是,在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严重损坏了生态环境,使我国面临严峻的资源生态问题。在国际形势、社会形态、生态结构异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我国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也很难直接借鉴西方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而这种“前无古人”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则需要我国政府摸着石头过河,认真研究国情,仔细探索方案,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本土形态的完备制度体系。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念被提出来。生态文明建设也要迎合这一时代主题的号召,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法制化进程中,依法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依法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最终使生态文明建设得以在法制上常态化。这种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常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突出位置,毫无疑问,这将是我国甚至全人类在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常态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空前难题。

2. 地方政府生态观亟需转变

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发展,这种发展速度将成为新常态。在转型期内,经济发展需要磨合期,一些地区的经济效益可能会有所下滑。由于经济发展与政绩挂钩,生态问责和生态政绩制度的缺乏,再加上部分政府官员对新兴产业、创新型驱动产业不熟悉,不敢轻易尝试创新型发展模式,习惯性以卖地刺激房地产、或者引进资源污染型企业等方式来驱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工业,高耗能、低效率的企业仍会是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循环的、绿色的、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会遭到冷落。虽然十八大报告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环节、全过程,但诸多的政府人员似乎只看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生态问题亟待解决的紧急性还认识不到位。由于这种生态文明建设观念认知的不足,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力度弱化,甚至使生态文明建设空于口号、流于形式。因此,如何使政府官员强化生态发展理念、完善生态问责制与生态政绩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攻坚点。

3. 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博弈

生态利益是指生态文明给国民带来的好处;而经济利益则体现的是一种物利观、金钱欲、虚荣心。“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表达出的是人类活动的趋利性。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往往表现着这一趋利性原理,利益至上的观念一旦占据了心里的主导位置,生态文明建设所带来的生态利益很自然就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上。但从长远战略上看,生态利益远大于短浅的经济利益。周国平说过,人类不愿轻易尝试改变,因为改变会把人带至一个未知的领域,而在这个未知的领域中又会有未知的风险。因此,

如何使企业改变的传统发展理念,大胆创新,探索出适合原有企业的生态发展模式,引导企业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成了一个难题。

4. 生态文明建设与消费方式的对冲

投资、消费、净出口被形象地比喻成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可见消费不仅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消费行为伴随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是人们生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见消费在生产生活、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消费方式的生态与否是影响着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下社会,一种奢侈性的、炫耀性的、挥霍性的消费方式正大行其道,这种消费之风席卷整个社会,甚至愈刮愈烈,可谓所向披靡。这种跟随流行风转向的消费方式不是一种有所求的实用价值的消费,简单地说,消费者并不是消费物品本身,而是看重了物品所带来的附加值,或者说物品是某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这种不注重实用的消费观,虽然刺激的消费,拉动了需求,但是却使资源消耗加剧,造成生态失衡。

5. 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责任的冲突

生态责任,顾名思义,就是社会各主体为生态文明的建成所应承担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成离不开社会各主体生态责任观的树立和生态文明观的践行。意识指导行为,并决定行为,生态责任意识的淡薄,势必导致人在生产活动中对生态造成破坏。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各主体的生态责任意识比较淡薄,甚至缺乏、空白,而这种生态责任意识的缺乏,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在此方面的教育缺失有关。众所周知,教育的三大领域:家庭、学校和社会,而在这三大教育领域中,生态责任方面的教育可以说是盲区。什么原因致使生态责任的教育缺失?第一,家庭只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只要孩子成绩优秀,就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使孩子在生态意识上毫无观念。第二,学校只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生态责任相关的教育课程缺乏,生

态环保的活动少,使学生的生态责任意识淡薄。第三,社会以“钱”为信仰,缺少一种生态责任践行的氛围。由于三大教育场所忽视对公众的生态责任意识的教育,致使公众无法接触到生态责任意识的传输渠道,继而使国民的生态责任意识成为空白。因此,如何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生态责任教育功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研究内容。

三、新常态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讨

1. 健全生态文明相关的法律制度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生态问责机制、生态政绩机制等,发挥机制的约束引导作用。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导航员,首先,要敢于创新,摒弃旧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理念,树立生态经济的发展观,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纳入政府工作人员的考核中,并提高生态考核的权重。例如,政府领导干部实施分区包干,人员分工实现地区的全覆盖,实行责任到片,责任到点,责任到人,形成严密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管机制。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也要全面融入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也要健全法律法规,依法严格处理生态问题,严格问责法规,行政机关不能仅以简单的罚款作为处理措施。在新常态的要求下,主管部门对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的企业进行严格处理,以治本为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坚决淘汰取缔落后企业。最后,政府落实制度,严守生态红线,优化地区生态结构。例如,政府可以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生态城市工程等来引导生态经济、生态责任的践行。

2. 企业结构升级,延长产业链

政府依托地区原有的优势,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生态农业等,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在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企业要明确自身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自觉地对自身发展所造成的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的后果进行补偿,履行保护生态、治理污染的义务。企业为了适应新常态,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等方式来降低能源消耗程度、环境污染

程度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程度,这种产业模式的转变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共赢。在新常态下,倘若企业造成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而拒不履行生态责任义务,那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将会大跌,进而企业市场缩小,影响其经济效益,甚至,企业会面临着生命的终结。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改革,政府要简放政权,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因此,政府在企业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的延伸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好引导督促工作,第二方面要做好服务工作。例如,政府可以帮助企业寻找循环经济联盟、生态经济企业联盟等。此外,政府也可积极引进适合优化本土发展的企业,使其能和本土原企业的生产流程形成配套延伸。

3. 倡导生态文明消费观

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包括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和绿色消费。绿色、可持续、生态的消费方式,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因此,要积极引导生态文明消费,使消费者树立起生态文明消费观。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提倡适度消费。过度的消费行为使人欲望膨胀的一种体现,而对于生态文明来说,确实是对资源的浪费。适度消费观可以控制人的膨胀消费欲望,避免跟风消费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第二,提倡文明消费。炫耀性的消费是种奢侈的消费行为,而奢侈的消费是一种满足虚荣心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恰恰就成了过度消费。而文明消费就是提倡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实用主义消费,以一种精神的文明作为引导,进而忽视外在的物质消费。第三,提倡绿色消费。在消费过程中,要反对挥霍消费行为,杜绝“一次性”的消费理念,不要紧跟消费潮流、过快更换消费品。绿色消费倡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在购买商品时,仔细考虑商品的实用价值,并且考虑消费的产品是否为绿色、消费的行为是否对生态造成破坏。最后,营造绿色消费的氛围。绿色消费氛围促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符合绿色消费理念,进而容易形成一个庞大的绿色消费群体。随着绿色消费群体规模的扩大,对于企业而言,这个庞大的绿色消费群体成了一个潜在市场,这个市场又反过来刺激引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从而又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模式的建立。这种良性的循环模式,大大促进了生态

文明建设。

4. 提高国民生态责任意识

良好社会价值观的树立、践行,能不断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因此,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必须使国民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观。而生态文明建设观的树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所以,从教育角度入手,利于解决生态问题。首先,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不仅要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还要注重对孩子生态品格的塑造。其次,在学校教育中,学校不仅要注重学生的成绩,更要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把品行、时间与创新能力放在教育的突出位置上。再者,注重社会教育。人,并非个体独立存在,而是具有社会属性,依附于社会群体而存在。就传播学中的“镜中我”理论来看,本我很大程度上会注重社会上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并且很有可能会按照他人的评价改变掉自己不符合大众心理期许的行为,使自己逐渐成为符合大众心理期盼的形象。

5.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我国在面临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的形势下,要有壮士断腕之决心,打一场漂亮的生态保卫战,力求使生态文明建设结出丰硕之果。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仅需要多个部门的联合奋斗,而且,离不开公众对生态文明观的广泛支持和努力践行。“APEC 蓝”展示出了我国的大国形象,得到了国际上的一致好评。这也让我们深刻明白了,只要通力合作,就能实现目标。就目前而言,我国较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上还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仅仅依靠国内各部门的联合还远远不够。我国必须积极深入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借助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借鉴西方先进的产业发展模式等,并将这些用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态文明经济的发展和过程中,扬长避短,最终实现互惠互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美丽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责任教育研究”(13YJA710015)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部分成果。

(作者系淮海工学院教授)

浅析儒学复兴与现代文明

刘泽华

近年来,“儒学热”持续升温,尊孔读经一浪胜过一浪,与之相随的是曲下双膝、顶礼跪拜的现象。这是文明的提升,还是倒退、扭曲?值得再思考。

谈国学、讲儒学因说的天花乱坠有如彩云遮日之势,但国学、儒学的范围何所指,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常常看到把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的现象。有人又提出“新国学”,再分“大”、“中”、“小”。“大”者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56个民族古今者之学”;“中”者“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小”者“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等等。

国学、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不讲概念的内涵,任意互换,这违反逻辑。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等同起来,且不说儒家中糟粕被遮掩,现在的国人都要儒家化,这能行吗?下面只谈谈儒学。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

我与无边际颂扬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或形态?相应的,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

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中国两千多年前

的哲人已有论说。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也是一种区分。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1999年、2011年南开历史系和山东大学《文史哲》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论著也不少。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囿于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形态”说。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分析方法之中,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我也是信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子。“文革”之后,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但至今仍认为各种思想都有阶级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说到社会形态,我则用“早期阶级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其后我还是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面对诸多新的命名,我总感到难以替代它,而原来所说的“封建社会”压根就不是“分封”问题,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即社会形态。所以今天我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贾谊就写过一篇《阶级》),但又有所修正,提出了“阶级—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

社会有形态之别,思想意识也有形态之别。思想观念与社会存在无疑有互动作用,某些思想

观念对社会存在会有某种超越成分,但它的主体必然是对现实社会存在的考察和认识,它的超越也必然是以现实的社会存在为起点,无法与现实的社会利益纠葛脱钩。孔子及其后的儒学是帝王认定的意识形态,对此不应该有异议吧?由帝王选用各种手段使其社会化,对此也不应该有异议吧?儒生大量涌入仕途,依附于王权,升官发财,成为官僚地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也不应有异议吧?儒学确实有关怀、同情民众的一面,但从大局说,儒家主流所论所为,对谁更有利?有些学者试图用“文明”、“文化”、“价值”把孔子、儒家与帝王制度分割开来,可能吗?“文明”、“文化”、“价值”难道没有阶级性?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能只顾左右而言他?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

儒家思想是封建帝王的工具

高调“尊儒”真是难于理解,这里只引三句:“没有孔子,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儒家文明不是针对中国人而设计的,而是对所有称之为人的而讲的”。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的,1949年后才逐渐确认有 56 个民族,难道都是孔子哺育的?把中华民族当成挂在孔子脖子上的项链行吗?我们不必假设“没有孔子”会如何,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极为复杂的历史因素和过程的综合,怎么能把历史简化到这个地步?孔子之前就没有华夏共同体?孔子之后又有多少人信孔子之学,难道可以将他们都排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外?

说到“导师”也是一样,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精神是多元的,至今依然如此。说孔子是尊孔人的导师当无疑问,怎么能加在中华民族的头上?

有人说,儒家文明是为“人之为人”而设计的。那么多不认同儒家文明的人是否就应开除“人”籍?孔子的独断性是很强的。我们有些人的说法比孔子更甚,真令人惊诧!

诸如此类的说辞都意在把孔子、儒学同帝王体制拉开,表示儒家是独立体系。但作为帝王确认的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呢?我不否认儒家对帝王体制具有很大规范性和制约性,而且对在位的帝王常常有很严厉的批评,历朝历代不乏忠谏之臣。像海瑞竟然敢用“家家皆净”嘲讽嘉靖帝,可

也正是他在死牢里听到嘉靖帝驾崩竟然悲痛的泣血。致君尧上与维护君主体制就是我反复论述过的一种“阴阳组合结构”,构筑了忠谏之儒主奴综合人格。在实际上儒者更多是从帝王那里求利禄,也算是一种交易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王也告白儒者:“书中自有黄金屋”;反过来,帝王能收买无用之人和反对派?离开帝王体制论儒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儒家思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还有把儒学这种意识形态高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本体”,是中国的“核心价值”等等。如果把这些限在尊奉儒学的范围内,当然合乎其逻辑,但扩大到中华民族,我期期以为不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历史渐渐进入现代化社会,儒家作为一种体系必然要瓦解并被新的社会观念排挤到边缘,这是无法抵御的大势。试问,这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体”、“核心价值”吗?就文化保守主义来说,也不止儒家一说,儒学能是儒家之外的保守主义的“根”、“本体”、“核心价值”吗?如果局限在尊奉儒家派内当然是自己的选择,但请不要覆盖中华民族!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含义,有多少是从儒学平移过来的?

儒家的道德论是它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不可能超越时代。作为具有“普遍思想形式”的概念,如礼义廉耻等等,无疑都可继续沿用,但都需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充实新的内容,即俗语说的“旧瓶装新酒”。

比如“礼”,儒学的礼主旨是讲等级贵贱秩序,有人说是礼貌——说礼貌固无不可,但礼貌主要是等级贵贱的外在形式。现在讲礼是以人格平等为内容的互相尊重方式。我们也大力提倡“孝”,孔子说“无违”是孝的最高境界,孝的规范首先是“顺”,父辞世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现在这些还适用吗?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鲁迅把旧道德说成“吃人”是文学的修饰,但人格不平等则是事实。对历史上的等级贵贱的评价可以多样,进行肯定亦无不可,但不能抛开事实。

现在有些舆论惊呼道德失序,道德沦丧,鼓

噪往日的道德如何如何美好,儒家的道德可以救世等等。我大不以为然。进入现代化社会必然产生相应的道德转型期,转型涉及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起伏跌宕令人眼花缭乱,但主流是从臣民观念向公民观念的转变,由崇圣向自主意识的转变。现在尊儒者又在制造新圣人,这是他们的自由;从另一角度说也是自主意识开放的一个证明。总的形势是公民性的道德观念在成长,仅这一点就远胜于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

在创建新道德过程中,传统的种种只能是资源。资源是全方位的,不限于儒家。现今常说的“以人为本”,其源头无疑是多元的,但这句话恰恰是被一些人嗤之以鼻的法家提出的。对历史资源分精华和糟粕是很难的,化腐朽为神奇也是常见不鲜的。如何开发资源,另行讨论。但一定要把

思想体系与引述佳句、隽语分开;也不能把当代人的诠释与古人同一化,如“天人合一”不能都约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古人有很多冥冥的神性。

话说回来,知识在逐渐走向市场化,眼下多种儒学、国学班都是公司办的。作为一种产品有人愿意买,也属正常。不过在我看来多为低级产品。至于严肃从事国学、儒学研究,那完全是正当的,也未尝不可市场化。由于互换概念,国学与儒学搅和在了一起,于是儒学研究机构的组建也颇有汹涌之势,如果不用纳税人的钱,是民间自由组合,未尝不是好事,但用纳税人的钱,也希望有关机构能慎重思考、全面权衡一下。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

(上接 47 页)

其人及“清静堂前不卷帘”词应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但陈词非为情拒之作,话本《张于湖传》创作早于杂剧《女贞观》,《玉簪记》的创作蓝本不是杂剧《女贞观》而是话本《张于湖传》。这就很清楚地梳理了一桩学术公案。《<玉簪记>本事与蓝本辨疑》也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核心期刊,发表后也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该文现收在本专著第五章第五节。

又如,明清时期屡有记载言发现唐代秦贯所撰《郑崔合祔墓志铭》(全称为《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对此墓志铭的真伪及墓葬主人与《会真记》、《西厢记》原型人物的关系,明清人莫衷一是。明清时期的文人常将墓志铭中的郑氏主人与他的崔氏夫人等同于《西厢记》中的郑恒与崔莺莺。该专著认为,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中并无郑恒这一人物,郑恒是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创造、王实甫《西厢记》继承并塑造的文学人物,此文学人物郑恒不可能是墓志铭中的传主。该专著对明清时期著录、记述《郑崔合祔墓志铭》的相关金

石、文史资料进行了梳理与考辨,认为此墓志铭应是真实可信的,墓葬主人和《西厢记》原型人物的关系则是荒诞无稽的。由于墓葬男女主人分别姓郑、姓崔,和《西厢记》中郑恒、崔莺莺的姓氏碰巧相同,加上明清卫道文人对于《西厢记》宣传男女自主婚姻不满,因此就将墓葬男女主人附会成《西厢记》的原型人物,附会者希望以此为《西厢记》中的郑恒、崔莺莺“洗冤”。附会时间长了,就造成了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效果,形成了人们的一些错误认识。该专著对此问题进行了清晰的辨析。

伏涤修教授的《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既能对戏曲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进行宏观把握,又能对戏曲文学和各类文学的关系进行细致梳理,又能对古代戏曲部分剧作的本事渊薮及创作蓝本进行探考辨讹,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较高的学术文献价值,相信此书一定会对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研究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糜竺兄妹历史资源开发探究

张名艾

糜竺、糜芳、糜贞兄妹是有史可查的，今连云港市云台乡关里村人，他们充满传奇的故事在《三国志》、《三国演义》中虽然所占篇幅不多，但都让人过目不忘。近些年来市有关地区在修编地方志、开发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海古神幽新景区时，糜竺兄妹的历史典故、神奇传说越来越多的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亟待开发的旅游资源。

一

研究“三国”、研究原始经济的专家认为糜竺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当之无愧的“资本家”、“商贸专家”、“物流业创始人”，清代名士陈文述诗中写到“当年糜子仲，富过卓王孙。能动神明监，因叨天地功。”糜竺(?—223年)，字子仲，汉东海朐(今海州区云台乡关里村)人。糜家世代经商，经商范围除了海属地区，又跨县、跨省把生意做到鲁、豫、皖、晋、陕、甘，在朐阳(今海州)、罗阳、徐州、洛阳建有糜家“商品仓库”、“批发、物流中心”。糜氏深谙做大经济、盘活流通的诀窍，要家族合力，要“广交朋友”、要“物美价廉”、要减少流通环节，还离不开官府庇护、舆论支持。他讲究“和气生财”、“儒商立业”，追求主仆和谐、政商和谐、官民和谐。糜竺让父母及弟弟糜芳在家经营山庄田园、收购加工农林产品、山珍海鲜、中草药；自己带小妹糜贞在朐县治所(今海州)建立商业桥头堡、中转站，开办商号；在外公家所在地(今赣榆罗阳镇)设码头、腌制海产品；在羽山(今东海)采制水晶珠宝。千方百计把今连云港地方特色产品做优、做大、做强，创造自己的特色产品、“拳头产品”，赢得四面八方好评和认可，并强力把它们推广到更多地区，占领市场。同时，他又

把外地物美价廉产品采购到糜氏“物流中心”、“销售网络”，结牢产供销产业链。地方志记载，糜竺的经营之道，赢来了“海州湾物产丰饶，海州儒商精明、糜竺会做生意”的赞誉。糜竺、糜芳兄弟平时注意习武，重视培养自己可使用的、强大的看家护院、护商队伍。糜竺成为“三国”时期威震八方、当之无愧的商业奇才。

有专家笑谈，近二十年海州小商品市场、四季青农副产品市场、义乌商品城等超级交易市场，一落户海州，立即“一呼百应”、车水马龙、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海州现在已经成为淮海经济区著名日用百货、农副产品、小五金商品集散中心。“这可能与1800年前糜家留下的商业‘基因’有关”，更证明“文化搭台”、“综合治理”、“地利人和”的威力。不管此说是否科学，但事实胜于雄辩。

汉时徐州就是华夏东西南北通衢，兵家、商家必争之地，糜竺在此建立了商业、物流大本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徐州牧陶谦赞赏糜竺兴商聚财能力，期望他扶持自己“造福一方”，任命他为“别驾从事”(相当于首长助理、外交财政军备总管)。陶谦“三让徐州”给刘备，糜竺做了许多联络工作。陶谦死后，糜竺亲自到小沛接刘备到徐州任徐州牧。汉建安元年(196)，吕布乘刘备出兵抵御袁术之机，偷袭了刘备的下邳城，并掳走刘备的甘夫人，窃夺了稀世之宝“‘缘起’水晶项链”。徐州一役，使刘备势力丧失殆尽，带兵转移到广陵海西(今连云港灌南一带)，余残兵败将不足千人、马不足百匹、粮草后勤断绝、日不保夕，举步维艰。正在刘皇叔一筹莫展时，作为当世最杰出的“资本家”、“地主、绅士”糜竺，看中

刘备忠厚仁义，又是汉王室之后。糜竺凭着超人的政治眼光和企业家投资智慧，建议刘备收拾残余人马到郁州岛（云台山）重整旗鼓，并说：“郁州人杰地灵，民风纯朴，景清物富。到我那里要人有人，要马有马，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只要你雄心不灭，何愁伟业不成。”一席话说得刘备转忧为喜。糜竺把家中骠马千匹、黄金万两、家僮奴仆两千，还有车服粮草全部资助刘备军用，深信他日后能成大事。

糜竺又请同乡王朗作媒，将小妹糜贞（有说名糜秀，糜英）许配刘备为妻。并把“糜竺院”更名“益州院”（时人称刘备为刘益州），大张旗鼓为刘备操办婚事。此时刘备兵实粮足，又有天生丽质娇妻为伴，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于是他选择陶阳石棚山下安营扎寨，操练兵马、演习阵法。经过两个月休整，上下同心，兵威大振，“当是西进中原时候到了”。刘备手指身边一块石头说：“我有人和，又有地利，现在就看天意了”。他挥剑劈石，一声巨响，裂为两半。当日，刘备挥师离陶西进。现在石棚山还留有藏军洞、试剑石、刘关张挥旗操练兵马指挥台等踪迹。

一代枭雄、求贤若渴曹操敬佩糜竺慧眼识珠、仗义疏财、善于交际、精于运筹，说“谋天下，需要糜子仲相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提任糜竺为赢郡太守，其弟糜芳为徐州相。糜竺兄弟不接受任命，继续帮助刘备集资扩军，跟随他转战各地。刘备取荆州时，先派糜竺到荆州和州牧刘表联系，并任命他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任糜芳为南郡太守。刘备取了益州后，又拜糜竺为安汉将军，视为心腹、待以上宾，“班在军师将军之右”，政治地位竟然高诸葛亮半筹，是刘备政治班底中职位最高的一位，职权相当于“军队总后勤部长、总参谋长”、“内阁财政部长”、“办公厅主任”，权倾朝野。诸葛亮他们对此也毫无怨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吃穿用度，无一不是来自糜家的私财，糜竺将私产变成了公产，将自家融入了蜀汉，体现出一种伟大的人格和杰出的投资眼光，此种高风亮节“非常人所能为也”。

东汉章武年间（221—223），糜竺弟弟糜芳任南郡太守，对英武盖世、盛气凌人的关羽心存二心，荆州危难，他“见死不救”。关羽“大意失荆州”被吴将杀害，糜芳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糜竺遂向刘备请罪，刘备说：“弟弟犯罪，与你何干！”糜竺总觉得不安和惭愧，不久病故。遵照糜竺“叶落归根”遗愿，刘备、孔明安排船载其灵柩，由其子糜

照、其孙糜威等护送回乡，安葬在刘备曾扎营练兵的“风水宝地”今海州石棚山下，立“安汉将军糜竺之墓”碑。糜照、糜威治丧期满，仍回西川，刘备信任有加，授将军职，后随军师诸葛亮“六出祁山，挥师中原，为匡复汉业屡立战功”。

上世纪石棚山修水库，海州区文化旅游局将糜竺墓迁移至原址不远的山脊上，铺青石板墓道，立高碑廊柱，墓后围屏雕刻反映糜竺兄妹光辉业绩浮雕。“糜竺墓”景点清幽庄严，朴素大气，峰岭环抱，青松翠柏摩霄。糜竺墓下方就是闻名遐迩的石棚和石曼卿读书处、点将台、试剑石、汉代二号墓遗址等，组成连云港大旅游区中不可多得的“石棚山景区”。

二

《三国演义》及新《三国》、《赵子龙》电视连续剧和京剧《长坂坡》、《单骑救主》中，最出彩的女中豪杰当数“糜夫人”。糜夫人小名“秀儿”，幼时常随母亲客居姥姥家（据说今罗阳小东关张大户），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的掌上明珠。大哥糜竺对妹妹更是呵护有加，带她到文墨之地（时名陶阳，今海州）“攻读诗书、题诗赋词，刺绣针织美轮美奂，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成为闻名一方的贤惠才女。今人夸奖“连云港出美女、才女，糜贞可列第一人”。刘备兵败逃到海西（今连云港市灌河口）转到糜家庄园（今花果山南麓关里村），糜竺妹妹糜贞与刘备结为恩爱夫妻，刘备将自己在徐州得到的稀世珍宝“‘缘起’水晶项链”作为定情之物佩在夫人项上，成为千古美谈。最近网上流传，“缘起”水晶项链”产自今水晶之都——东海，曾是糜竺引以为自豪收购的无价之宝。“传说中水晶项链有两串，一串叫‘缘起’，一串叫‘缘灭’。因为后者含不祥之意，在东汉初就不知所踪。建安元年（196）吕布偷袭下邳获得该宝，并转送到情人貂蝉手中，水晶佩佳丽，貂蝉更显雍容华贵，成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后来曹军夺取徐州，吕布命丧‘白门楼’。糜竺门客通过百转千难赎回了‘缘起’，并进献给刘备。似乎是姻缘天意，‘缘起’作为刘、糜新婚定情物，成为糜夫人日夕相伴之宝。长坂坡一役，糜夫人为保护幼子刘禅随赵云突出重围，自己投井而亡，临终前将‘缘起’塞在儿子怀中，可惜又在混战中遗失。之后，‘缘起’就再没有出现过，成为千古之谜。”

到了现代，东海“水晶项链”成为中外年轻人订婚时首选，婚姻“缘起”的标志，比“金项链”更有纪念意义。

《长坂坡》、《单骑救主》中最让人荡气回肠的情节是：长坂坡大战拼杀声惊天动地，曹刘双方各有胜负。混战中，赵云先保护甘夫人脱离险境，复返身杀入敌阵寻找糜夫人及其子阿斗。后终于在一残垣古井旁找到二人。当时糜夫人已经受伤，她明白如果赵云要照顾她，则三人命都难保，于是将襁褓中的儿子托付赵将军，嘱其千万保护刘后主脱离险境，并将身上佩戴的“缘起水晶项链”塞在儿子怀中，随后投井身亡。赵云呼天嚎地，推倒残墙覆盖古井，不让曹军侵害糜夫人遗体。赵云怀抱幼主，历尽艰险杀出重围，回到刘备身边。糜夫人的果敢坚决、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精神行为在“三国”时期，甚至中华历史上均独一无二。

近代评“三国”专家夸奖“糜夫人是《三国志》中着墨不多，但称她‘女中丈夫’毫不为过”。晚清诗人张百川《糜夫人故里》诗中写道“转恨沛城夫婿失，可怜长坂美人啼。甘孙并祀由他日，白帝城边夕照西。”诗意凄惨，让人心酸。文献典籍中关于刘后主（阿斗）生母是甘夫人、还是糜夫人，口径不一，近代研究《三国》专家倾向是糜夫人。后来刘禅（阿斗）被作为刘备第一个儿子立为太子。刘禅登基，追封其母为皇太后，在奉节“白帝城”为母建墓立“蜀汉昭烈皇帝糜夫人之墓”碑，将当阳长坂坡古井改名“糜夫人井”，俗称“娘娘井”。现在这两个古迹经过乔装打扮，已成为国内著名景区。

三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打造连云港为国际性的港口城市、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山海相拥的知名旅游城市，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是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措施。自古以来，连云港就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方，美妙的山连海、城连山，名山沃野、林丰粮茂生态，丰富的“海古神幽”古迹，晶莹剔透的东海水晶，神奇的传说和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西游记》、《镜花缘》古典名著，都是特色资源。连云港又是一片诞生或生活过许多彪炳史册英雄豪杰、贤臣寿星、文人墨客的地方。“三国”时期胸阳关里糜竺兄妹的神奇故事，就足以令人充满自豪。把糜家故里（云台山南麓）的糜竺院（益州院）及糜竺井、大橡树林、古槐树；石棚山刘关张操练过兵马的指挥台、藏军洞、试剑石及“糜竺墓”；赣榆罗阳生态园里的艾塘湖、糜夫人石雕像及与糜竺兄妹神奇传说相关的景区、景点进一步开发好，已经到了“文化先行”、“打造历史文化强市”

浓墨重彩的篇章。

海州石棚山是连云港著名游览区之一，春暖花开时节，山上山下桃花嫣红、梨花飞雪，林间及奇岩古洞溪坝间石板路曲径通幽，自然天成的美妙石棚、石曼卿读书处景奇貌美，再加上庄严肃穆的“糜竺墓”，威武雄壮点将台、试剑石，不由使游客焕发思古幽情。

赣榆罗阳生态园特色鲜明，艾塘湖绿岛上那尊雍容华贵、飘然若仙的“糜夫人石雕像”及基台上的“解说词”更让人浮想联翩。至于当地人传说糜夫人故里就是罗阳，我认为“事出有因”，尚“查无实据”。镇有关同志介绍，糜夫人外公、外婆是罗阳人，糜竺经商在此设立“收购站”、“连锁店”有史为证。糜贞经常随母到外婆家小住亦在情理之中。糜氏家大业大，富甲一方，“日进斗金”，门客僮仆数千，糜竺院经常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喧嚣热闹，所以糜贞母亲到娘家临产也未可知。东汉时，朐县地域范围就包括今赣榆东南乡镇、南北云台山、朐山等广大地区。罗阳生态园塑造糜夫人像无可厚非。相反，该景区还可以继续做足“糜竺兄妹”神奇传说文章，以提升景区文化品位。

云台乡关里村早就有开发“糜竺故里”设想，这里“糜竺井”保存完好，糜夫人浣衣处、浣衣石依旧，大橡树、大槐树虽然不是1800年前原物，但地方群众都认为山坡上的大橡树、糜竺井旁大槐树都有四百年历史，应该是糜竺故里汉时树木的后代。现在有专家考证今“关里小学”即是东汉“糜竺院”故址，今校门前摆放的几尊古石雕、石磴，就是近年当地出土的原“糜竺院”遗物。关里村与孔雀沟、东磊、渔湾游览区连成一线，附近还有“堆王山”，传说这是“舜葬苍梧”的坟墓，附近还有汉代名相“于定国墓”及“于公疇”和明代名士顾乾的“半山园”遗址。《云台山名胜区发展规划（修编）》已经国务院批准，南云台山南麓面临加速发展机遇期，糜竺故里景点乘势而上恰逢其时，在那里建立花果山景区南入口十分相宜。

连云港有“推动文化产业为支柱产业”的规划，建设文化连云港、生态连云港不能没有地方历史文化名人及名人故里支撑，特别是“三国”时期糜竺兄妹历史典故“铁证如山”，开发利用顺理成章。我们相信未来的历史文化名人糜竺兄妹的神奇传说一定会成为“海古神幽”连云港旅游大业中光辉灿烂名片。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融文化观照与文献考辨于一体的一部力作

——评伏涤修著《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

张文德

伏涤修教授继在黄山书社出版《西厢记接受史研究》、《西厢记资料汇编》两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后，又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该专著是他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的终端成果。该书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审美习性对于戏曲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又对戏曲文学创作与各体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还对古代戏曲部分剧作的本事与蓝本进行了探究。该书既有较强的理论品格也有一定的学术文献价值，是一部对于古代戏曲文学本事取材进行系统研究、融文化观照与文献考辨于一体的用力甚勤的著作。

笔者认为，《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较鲜明地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与特点：

一、对戏曲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文化考察，具有较强的理论品格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论述了史官文化、政治与公案文化、宗教与神秘文化对于古代戏曲创作的影响，论述了民间故事传统、文人创作传统、蹈袭翻案传统在古代戏曲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对影响古代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的各种文化原因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例如，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历史剧极其繁盛，著名学者吴晓铃说：“中国戏剧从它形成的那一天开始，就具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它在选题取材方面以历史故事最为丰富。”（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九集序》）

古代戏曲中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表现对象的剧作多达七百多种，这还不包括京剧和地方戏中的大量历史剧。该书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剧之所以层出不穷、高密度地涌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史官文化非常强势，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下，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其他文人乃至一般的农夫渔樵市井百姓，也不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都具有浓郁的历史情结，“受史学传统熏染，历史题材的各体文艺作品极其繁多。咏史诗、咏史词、史论文、讲史平话、历史演义小说层出不穷，听讲观赏历史故事成为人们尤其是下层民众重要的文化接受方式。在这样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下，以历史事件、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历史剧就成为戏曲作家们很自然的文化选择。”这就很透彻地说明，中国古代历史剧的繁盛不是偶然的，它是史官文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必然的结果。再如，中国古代道教题材戏曲数量也很繁多，也有数百种，而且道教题材戏曲的数量既多于佛教题材戏曲，也多于以儒家人物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创作面貌，该专著分析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和道教教理教义对人们思想精神的深远影响具有莫大的关系，儒家重教化，佛教强调苦修，而道教则注重现世享乐，道教的现世享乐思想尤其是成仙得道的美景宣传，既对统治者和权贵阶层具有莫大的诱惑力，也给受苦

受难的下层百姓展现出可以暂时忘却烦恼的快乐图景;二和道教文学、文化的广泛传播有关,我国古代志怪之书盛行,道教人物故事广泛流传,道教神仙谱系极其庞大而富有影响力;三和政治生态环境有关,剧作家往往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敢直接公开表露,于是便借助道教题材戏曲迂回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内心隐曲,借神仙和隐士之口宣泄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内心不满;四和道教神仙人物喜庆象征意义的民俗化接受有关,道教许多神仙被赋予了身份尊贵、长生不老、神通广大、快乐逍遥的形象标签。正是由于这诸多原因,道教题材戏曲极受剧作家的青睐和观众的欢迎。古代传统文化、民族审美习性中的其他方面对于戏曲创作的影响,该专著中也有切中肯綮的分析阐述。

二、对戏曲文学与各体各类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对戏曲文学与各体各类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论述。以戏曲文学和史传文学的关系为例,该专著认为,戏曲文学和史传文学具有多方面的密切关系,正史纪传及稗记杂乘中丰富的故事题材为古代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大量可资入剧的故事、情节,而史传中的高超的叙事手法也为戏曲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艺术借鉴。如《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在戏曲文学中得到了表现,《史记》中纪传体的许多手法也都在戏曲文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又如,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明代无名氏的《和戎记》、清代尤侗的《吊琵琶》等多种戏曲,都是反映王昭君故事,而细细探究这些昭君戏,可以发现它们和史书及不同时代流传的不同文体的昭君故事具有密切的关系。

再以戏曲文学和志怪之书的关系为例,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战国时期的纪异、语怪之书《汲冢琐语》、《山海经》,两汉时期的志怪之书《神异记》、《洞冥记》、《列仙传》、《异闻记》,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列异传》、干宝《搜神记》、葛洪《神仙传》、王嘉《拾遗记》、陶潜《搜神后记》、刘义庆《幽明录》,唐代志怪传奇集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薛用弱《集异记》、谷神子《博异志》,再到后来的各种志怪笔记小说集,

如宋代洪迈《夷坚志》,金代元好问《续夷坚志》,等等,这些志怪之书都成为戏曲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武库,古代戏曲中许多剧作的本事来自于志怪之书,志怪之书的情节与手法也对古代戏曲许多剧作具有实际的影响。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对古代戏曲一些剧作的本事来源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例如,我们都知道,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都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西游题材戏曲就对《西游记》的成书具有重要的影响,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研究西游题材戏曲是研究《西游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该专著经研究后发现,西游题材戏曲有许多故事系统,各个故事系统具有不同的本事来源,其中陈光蕊、江流儿题材戏曲,是依据唐宋笔记报冤类故事改造而成;猿猴题材戏曲,来源于古代的猿精故事;二郎神题材戏曲,来源于二郎神崇拜;唐太宗入冥与崔府君断阴府事题材戏曲,来源于唐代话本。对于各类故事来源,该书也作了认真的梳理分析。例如关于二郎神,他原指秦代蜀郡太守李冰次子李二郎,二郎神成为民间祭祀神,源于人们对根治水患的英雄的崇拜,但是二郎神故事在后世流传中不断融入、附会进来其他一些英雄人物事迹,逐渐地,二郎神所指不一,就不单是指李二郎了,赵二郎、杨二郎、邓二郎等也成为了二郎神,而且每种二郎神说法都各有来历。该专著就对民间传说与文学作品中的李二郎、赵二郎、杨二郎、邓二郎等多种说法的来历进行了梳理。再如唐太宗进地府又还阳的故事,可以溯源自唐代张鷟的《朝野僉载》,而对这一故事较详细地进行记述的是唐代的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此记写唐太宗李世民之兄李建成、弟李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对质,崔子玉判官在阴司对唐太宗进行勘问。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对许多故事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了解和把握。

再如,孟姜女题材戏曲、牛郎织女题材戏曲、董永遇仙题材戏曲等民间传说剧对传说故事内容的吸收与改造,该专著也有较详细的梳理和论述。

三、注重学术发现和订讹辨正，具有较为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辨疑精神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对一些学术问题能够进行独立审慎的思考，对学术研究中的—些歧见、误解、不妥之处能够加以辨正，该书有一些新的学术发现。例如，包拯包公是古代最有名的清官，包公戏是古代公案戏中最重头的戏，古代的包公戏有几十种，人们一般认为，包公戏是依据包公的事迹综合、改编而成的。而该专著发现，史传稗记中记载的包公故事基本没出现在包公戏中，而包公戏中所表现的包公故事基本上没有历史记载。包公戏中的包公故事有的是捏合他人事迹或将包公形象嫁接到其他故事上去的，更多的则是本事无考的虚构之事。那么，包公戏没有历史资料记载是否就意味着包公戏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包公戏非常具有认识和思想价值。伏涤修教授认为：“包公戏中的包公故事虽然少有历史上包拯行事的文献依凭，却至为切合包公的个性特征和行事风范，包公被选作为断案清官的‘箭垛式’人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包公戏虽然多有虚构，却是人民心声的反映，人们不断地充实包公形象，正表明了人民大众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政治清明的期盼。该书如此辨别和分析，既廓清了认识误区又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使得我们对包公戏的认识更加准确而深入。

再如，人们一般认为黄粱梦题材戏曲都是来自于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该专著认为，黄粱梦题材戏曲实际上有两个故事系统，一个故事系统表现吕洞宾度卢生黄粱梦觉内容，另一个故事系统表现钟离权度吕洞宾黄粱梦觉内容，“这两个故事系统的戏曲虽然都以梦觉悟道为核心情节，尤其是都包括黄粱一梦这一故事框架，可以说是具有相同的叙事来源，但两个系统戏曲具体的故事内容并不相同，它们与《枕中记》及道籍仙传的关系也亲疏有别”。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的“杨林”一则可以算是黄粱梦觉故事的源头，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则是黄粱梦觉题材戏曲的重要来源。钟离权度吕洞宾黄粱梦觉题材戏曲，除了以上故事渊薮外，从故事内容而言，另有故事出处。《道藏》中所收的元初赵道—

编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五“吕岳”条和元代苗善时《纯阳帝君神化妙通记》卷一“黄粱梦觉第二化”条，是钟离权度吕洞宾黄粱梦觉题材戏曲的直接故事蓝本。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对古代戏曲一些剧作的本事与蓝本进行了辨疑。例如关于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的创作蓝本，湖南省社科院向志柱研究员提出《牡丹亭》的创作蓝本不是“话本体白话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而是“传奇体文言小说”《杜丽娘记》，向志柱认为，“传奇体文言小说”《杜丽娘记》创作时间最早，“话本体白话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是在《杜丽娘记》的文字基础上扩编演绎而成的，《杜丽娘慕色还魂》不仅因袭了《杜丽娘记》而且也借鉴因袭了汤显祖《牡丹亭》。伏涤修教授研究后发现，向志柱研究员的论文观点站不住脚，伏涤修教授以翔实的证据说明，不是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扩编自传奇《杜丽娘记》，而是《杜丽娘记》删削缩编自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不仅是《杜丽娘记》的渊源所自，更是汤显祖《牡丹亭》的创作蓝本。伏涤修教授的《〈牡丹亭〉蓝本问题辨疑》发表在权威期刊《文艺研究》，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和赞许，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该文现收在本专著第五章第四节。

再如，关于明代高濂的《玉簪记》，写的是南宋著名词人张孝祥和潘必正、陈妙常的故事，学术界一般认为该剧本事记载源于《古今女史》或《情史》，其创作蓝本为明代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而对于张于湖（张孝祥号于湖居士）陈妙常情挑情拒之事之词的真伪，研究论著或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伏涤修教授在对《玉簪记》的创作本事与蓝本详细考察后发现，学术界对《玉簪记》本事与蓝本的认识存在若干舛误，伏涤修认为，《古今女史》与《情史》的成书时间迟于话本《张于湖传》、杂剧《女贞观》、传奇《玉簪记》，两书绝非陈妙常拒张适潘本事记载的渊薮，张于湖与陈妙常情挑情拒之词现知最早出处是话本与杂剧，所谓张于湖情挑陈妙常之词断为后人伪作，陈妙常

（下转 41 页）

关于改进体育传播的思考

古丽给娜·赛买提

大众媒介在体育运动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传播角色,具有向大众传递赛事信息、点评热点赛事的功能,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为了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传播虚假新闻、聚焦体育明星花边新闻,走上一条娱乐化体育新闻的异化之路。

体育大众传播中的异化现象分析

传播媒介发生异化

目前,在体育传播中呈现出了一种“竞技传播”倾向,因为竞技体育是以激烈的斗争性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为主要特点,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媒介往往会通过舆论引导人们的行为思想。媒介和商业利益的共同作用,让媒介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体育已经成为了媒体盈利的一个主要产业,面向全球,影响巨大。

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只是一个游戏形式,但如今它却成为一种商业活动,甚至成为人们赌博的一种方式。现代体育的构成是一个标准化和商业化的共同格局。体育节目的形式主要由媒介掌控,掌握着节目的市场价值和成本。媒介是体育传播的领导和塑造者,媒介决定着体育运动的发展方向,最终让体育运动发生异化。

传播内容发生异化

娱乐化。体育传播娱乐化指体育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夹杂着感情因素,具有煽情性和刺激性,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让体育更加生动形象,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体育实现娱乐化是当今体育发展的主流。体育成为一种人们娱乐消遣的方式,在体育娱乐化的过程之中主要针对的是体育明星,过多地关注传播体育明星的绯闻,来吸引体育爱好者的眼球,但是对于体育项目的传播逐渐缩减,体育传播的内容发生改变,最终导致被异化的结局。

在体育娱乐化传播的过程中,应把握一定的原则,更多地规范其娱乐方式,同时还需要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只有把握好体育娱乐化发展的方向,避免内容产生异化,才能实现体育传播的良性循环。

利益化。体育运动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体育。体育运动的竞争方式源于原始人类的攻击性释放,但是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是在一定的规则之下公平进行,如果在体育运动中故意伤害对手,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平等的体育竞争不是暴力,这属于人类原始本性的转移。相反,不平等的竞争容易产生暴力现象,这是在一方违反比赛规则的情况下产生的,部分媒介故意利用体育竞争过程中的暴力现象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标准化。当前处于消费型社会,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然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也被赋予了消费职责。许多专家研究发现,在媒介社会环境下,人们通常借助媒介传播的信息来了

解社会。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标准化信息是影响人们行为思想的主要力量。

在体育大众化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一场体育赛事还是某一个体育明星,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媒介的虚拟商品,被媒介赋予特殊的价值,体育自然而然被物化了。这种物化现象就是借助媒介的标准化信息的传播来实现。

等体育明星与某种商品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之后,这些商品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会对人们产生无尽的诱惑,这种诱惑来自人们对媒介标准化信息的理解和崇拜,所以商品的意义不再体现在实用价值上,更多的是在体育价值方面。广大消费者就会源源不断地购买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商品,从而让商品经销商获取更大的利润,体育正是在媒介的异化作用下,利用标准化的符号产生不同的价值,最终的受益者正是体育传播的媒介。

改进体育传播的措施

提高体育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

现阶段,《新闻法》还在制定优化过程中,对于传媒工作者的约束还只是停留在监督方面,并没有具体的政策法规进行规范制裁。因此,对于新闻工作者要实行岗前培训和考察,并开展定期组织培训,加强体育人文教育,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一个优秀的体育报道能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体育新闻工作者应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团结、稳定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实事求是,用自己高尚的职业情操实现体育文化传播的社会价值,切实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

加强体育新闻专业宣传,提高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

站在我国体育传播纵向角度观察,媒介在对体育新闻的宣传过程中,对于体育项目的新技术、新战术不能在内容中得以有效体现,一些优秀的训练方法、管理方式也没有得到合理传播,导致体育传播面窄,偏重于体育竞技项目的报道。

体育传播要想实现社会文化价值,就需要正确结合非体育因素,例如政治、经济、思想观念、

文化艺术等。将这些因素合理地渗透到体育传播中,让人们通过体育赛事来观看体育运动员拼搏、进取的精神,对更快、更高、更强的憧憬,让人们通过足球来认识世界文化和历史,这就是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创建科学的体育传播观,弘扬人文体育精神

我们在一些体育新闻报道中发现,社会体育在体育新闻中严重缺失,这种现象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与我国基本国情严重不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体育新闻资源的极大浪费,让我国倡导的“全民健身计划”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因此,媒介在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既要考虑自身经济利益,更要考虑到社会效益,把握好新闻传播的度,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职能。在进行体育报道的过程中,满足人们欣赏需求的同时,更要做好体育相关信息的真实报道,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正确引导体育爱好者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

目前,我国体育文化中缺失的是科学的体育传播观,然而体育在人们思想建设中作用重大,主要体现在:体育是人们交流的一种方式,通过体育交流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们通过体育比赛能够培养责任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另外,体育传播中也存在媒体过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忽略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体育新闻传播工作者素质有待提高。

人文精神追求的是真、善、美以及人类文明的高度和谐统一。为了弘扬体育的人文精神,首先,要树立发展理念,以适应全球化和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其次,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为体育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要积极培养传媒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人文素养。

目前体育大众传播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体育文化传播中极易出现的异化现象,我们要积极倡导人文体育精神,让人们认识到体育文化的本质,从而实现对异化现象的遏制;同时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让体育传播实现良性循环,鼓励人们发扬体育精神,实现体育大众化传播的长远发展。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

论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 问题及改革重点

王 健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特别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指引下,智库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更是指明了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任务和实施路径。我们要抓住时机深化改革,特别是推进智库的体制机制改革,使其充分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一、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评估

近年来,我国的智库发展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各类智库都在自觉地向新型智库转型。美国宾州大学麦甘教授是国际上最早开展智库排名研究的学者,他的团队每年通过主观评价法对全球智库进行排名并作出分析。在历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可以发现,中国的智库总数不断上升,目前已仅次于美国的 1830 家,达到 429 家。与此同时,进入顶级智库前 150 位的中国智库也逐年增多。《全球智库报告 2014》指出,我国共 7 家智库入围“全球顶级智库前 150 位”,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 2013 年相比,新增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一家。排名最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全球第 27 位。

由于麦甘教授邀请的评价专家主要是国外专家,因此排名靠前的中国智库绝大多数从事国际问题和世界经济研究,无法确切反映中国智库在国内政策决策和综合决策方面的影响力。为此,从 2013 年开始,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与麦甘合作,邀请国内智库、政府部门、媒体等单位的代表,开展多轮主观评价,通过广泛与定向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分别就中国智库的综合影响力、系统内影响力和专业影响力进行评价与排名,连续发表了相关的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影响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影响力指标,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

从影响力的角度分析,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影响力的智库集聚北京、上海等政治和经济中心。在连续两年的报告中,综合影响力排名前 10 位的智库,北京占到 7 家,上海有 2 家。京沪两地占了 90%,特别是北京占到 70%。如果再放宽一些看,在综合影响力位列前 30 的智库中,北京依然占到近 2/3,上海约 1/5,其余也大多在沿海地区。这种智库集聚度与政治、经济资源集聚度高度一致的现象,显示了智库发展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必须靠近决策中心,靠近客户需求。事实上,美国的著名智库也主要集中在华盛顿和纽约,特别是华府的麻省大道上。“马路两边

是一家挨着一家的智库大楼,仿佛穿梭于一家家‘思想商店’之间,正是这样的‘思想商店’,浓缩着政治和社会精英的政策主张,影响着华府的政策走向和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同时,这也反映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也比较低,科学决策意识不强,智库的政府和市场需求不足。

第二,有影响力的智库大多是综合型智库。现今国际智库的发展呈现出两极趋向,即一方面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等这样的综合性智库在各国国内和全球的影响力始终领先,而与此同时,一些专注专业领域的智库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例如号称英国“三杰”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三军研究所在全球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影响巨大,特别是在“二轨外交”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香格里拉对话和麦纳麦对话,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讨论东亚和中东安全问题的重要平台。综合性与专业性是国际智库发展的两大趋势,而中国智库目前仍处于专业化分工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必须在继续做强做精综合性智库的同时,切实培育和打造一批具有自身特点的专业性智库,避免求大求全,同类竞争,重复发展。在这方面,地方高校、地方社科院和民间智库更应有结合地区和专业特点,形成差异化优势的自觉。

第三,有影响力的智库主要聚焦国家战略。总体而言,北京的“国字号”党政军智库和民间智库由于重点关注国家层面发展战略问题,因此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在综合影响力排名前30中,此类智库合计占比超过50%。相对而言,地方社科院和高校系统仅占20%。但是,在排名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地方性智库如果能发挥地区特长,主动介入国家战略,其影响力也会提升。例如,地处对外开放前沿、肩负先试先行责任的上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长期致力于中国外交战略,排名一直位列全球顶级智库前100位,而上海社科院近年来也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2013年7月,上海社科院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未来10年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总方案》,这是国内关于当前改革总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研究中唯一一份来自地方的报告,对经济改革

提出了约三类十项政策性建议。因此,当年就首次进入了社会政策领域国际顶级智库前50位。

二、中国智库转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中国智库的转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客观分析,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智库无法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时效性的产品。除了民间智库,我国智库都是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这种“体制内”特点决定了目前其工作主要表现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和阐释政府政策。此外,体制内智库虽然已经开始积极转型,但“经院式”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特别是在既往的科研考核和评价体系指挥下,研究人员大多缺乏智库意识和自觉,关注的是学术专著和论文,不愿结合理论基础,在深入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写作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特别是缺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的能力,因此无法提供党和政府亟需的、具有前瞻性的“储备性政策”和及时的对策建议。西方智库则大都以承担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作为业务重心,并提出自己独立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前瞻性的主张。例如,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发表了一篇智库文章,评论“苏联行为的根源”,由此帮助美国政府确立了此后近40多年的遏制战略的基础。又如,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不久,美国民主党智库人士根据美国国力变化和国际格局调整,及时提出了“巧实力”的外交建议。

第二,智库缺乏合理的人才构成和内部分工。一般来说,西方高端智库的人才构成和科研活动都非常重视跨学科和协同综合,不仅强调研究人员具有专业的深入、学科的广度、科学的高度和前瞻的远度,而且鼓励在研究过程中协同创新。在综合性智库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同等重要,并形成合理的比例。例如,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经济学家占21.2%,数学家占11%,工程技术人员和计算机科技人员占10.3%,物理学家和环境学家占9.6%,系统分析学家占8.6%,生态与社会学家占8.2%,运筹学家占7.5%,生物学家占3.4%。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强调,一个专家团队的建立,主要是基于成员的团队精神和在追求特定目标上的技术能力,团队的成员在各个方面都是专家。他们都能

以其独特的学识与经验,来做独特的贡献。此外,国外智库高度重视辅助人员比例,重视研究助理和行政人员的作用。辅助人员不仅必须是名校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且还要求具有良好的研究能力、组织技能和专业的办公室管理经验。兰德公司的经验是“与其配备两个优秀的研究人员还不如给一个优秀的研究人员配上一个合格的秘书”。华盛顿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与行政辅助人员的比例约为1:1,胡佛研究所为1:2.5,布鲁金斯学会为1:3。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100名左右,但辅助人员有近300人,主辅人员比例达到1:3。这300人中包括研究助手和公关、捐款、行政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而目前中国智库一味强调科研人员的高比例,无法使高级研究人员从日常的行政、后勤、联络等事务中摆脱出来,专心进行项目和学术研究。这种低效率的人员配置和内部分工必然导致低效率的科研组织。

第三,智库难以形成有效的政府、社会和国际影响力。国外智库高度重视其自身的影响力,设有专门的公关部推广智库产品,不仅通过出版专题文章、著作、期刊、内部报告、电子出版物等来发布各种政策信息和政策建议,而且还构建影响政府决策的人际传播网络,搭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然而,中国的智库虽然大多是体制内智库,但距离政府日常操作较远,缺少与政府之间的紧密沟通,再加前面提到的成果前瞻性和时效性差,从而缺乏足够的政策影响力。与此同时,智库人员往往习惯于学术圈内的交流,不能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介绍和倡议,更缺乏通过理论产品引导社会公众认识的理念,因此难以实现智库舆论引导和社会服务的功能,无法成为民众的“思想罗盘”。更有甚者,有些学者在公众舆论中雷人雷语,更是大大损害了智库在公众当中的公信力。长期以来,中国智库主要关注国内问题,对全球性和国际性问题的关注度相对不够,这就导致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不高,话语权缺失。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状况有所改变,“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一带一路”等中国智库提出的话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但就整个国际化水平而言,程度还是非常有限。

三、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改革重点

(一)智库自身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我国智库建设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主要是由现有智库所面临的内外体制机制束缚所造成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深化五项改革,即深化组织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深化研究体制改革;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因此,中国智库进一步增强改革的紧迫性,努力适应智库建设的新要求,重点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

第一,学习借鉴国外智库发展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并结合中国国情特点,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智库建设有法可依、有序推进。这不仅可以帮助确保各类智库发展的正确方向,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还可以促进各类智库结合自身优势,分类发展。例如,国家级高端综合型智库,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各类政府研究部门应该重点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组织或委托开展相关研究,形成国家战略层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和方案;高校智库则应发挥基础理论性强,学科综合优势明显的特长,在提升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瞄准国际前沿性、战略性的课题开展综合研究,为党和政府提供基础性、理论性、前瞻性的决策咨询服务;各个地方社科院智库,除了极个别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之外,主要应该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突出地方特色,提供解决方案或者深入调研,为国家层面战略决策提供国情、省情或市情调研信息;而民间智库则应注重各自的专业特长和灵活机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和科技创新,形成小而精的咨询特色,并在智库组织国际化等方面积极探索,发挥创新示范功能。

第二,在确保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努力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独立性。智库的独立性不是与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相背离,而是指在承接项目和建言献策中,秉持中立、公正、科学和客观的原则,不为委托方的局部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智库开展独立研究,一方面要避免为了经济利益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尤其要防止“附庸”政府与“迎合”民意两种不良倾向,从而保持智库在决策者和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和独立

性;另一方面,不能仅仅成为政府文件的解读者,而应建言、论证于政府决策之前。政府决策出台前,应委托几家智库从不同角度作方案论证,最后加以综合,尽量避免部门智库的一家意见、形成部门利益,从而使政策决策更加公正、客观和全面。2009年,上海市在制定《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就委托了市教委、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范大学三家单位做A、B、C三卷,分别从教育管理、宏观经济和社会教育学三个视角加以研究,最后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纲要就比较客观全面,获得了好评。另外,应该鼓励和允许相关智库对现有政策作“不可行性”研究,从而使得政府决策考虑更周全,避免决策盲区。

第三,要深化改革,创新智库内部管理体制机制。按照智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进一步完善智库科研考核评价体系,坚持影响力导向,改变以往重专著、论文的科研机构评价标准,逐步将政府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作为考核指标,提高专报及其批示、媒体解读和分析、参与政府重大决策过程的分值。要优化智库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尊重人才、尊重科研规律,切实改变完全参照政府机关的经费使用规定,将人力资本作为智库经费资源配置的第一要素,借鉴国家软科学的经费分配办法,同时要鼓励智库积极探索多元化经费筹措方式。要推进科研项目改革,完善选题、立项、过程管理、成果评审机制,创新智库影响力营销机制,激发智库的潜在活力和动力。要探索智库的人事制度改革,合理配置智库的人才结构,特别是加强与政府之间的人员交流。需要指出的是,良好的组织架构是知识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加强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的转化效率,增强智库的影响力。要积极采取措施,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成果转化效率。建立智库与政府之间的顺畅通道,形成全媒体的成果发布机制,注重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加强政策效果和社会影响反馈机制。在增强影响力方面,一方面要根据研究成果的不同属性,以内部决策专报、公共学术报告、报纸、电视、电台、社交网络与自媒体等不同形式扩大成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加强对智库人员媒体沟通能力的培训,形成自己的传媒推广战略和媒

体形象设计。在国外高级智库机构中,有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媒体公关。它不仅指导你如何在类似《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全球媒体上撰写评论文章,还会教你如何做电视访谈节目,甚至包括要求穿深色西装、保持一定的语速等等。美国智库排名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媒体曝光率。

第五,要坚持开放性、国际性和全球化理念,加强与国际智库的合作交流,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和公共外交功能。国外著名智库为了确立自身对全球的国际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大都采取开放政策,坚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发展理念。例如,法国的欧罗普基咨询公司平均每年要和580个企业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其中60%是国外企业;巴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三分之二的业务是对外的,每年大约签订包括30个国家在内的300多个合同;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的国际业务也十分活跃,每年接受国际方面的个别委托研究与咨询合同约2000余件,与世界65个国家的800多家公司保持联系。为了进一步拓展国际影响力,国际知名智库还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如美国的赫德森研究所在法国巴黎和加拿大蒙特利尔都设置了分支机构,在日本东京设置了办事处;斯坦福研究所也在世界十几个城市有自己的分部;日本的野村研究所在纽约、伦敦、香港和巴西均设置了分支机构;英国的简氏情报集团目前已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新加坡等地设立多家海外分支机构,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信息集团公司。此外,国际著名智库还是推进“二轨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目前还比较低,要采取有效手段切实加以推进。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与国际智库开展合作研究,熟悉并借鉴国际智库运作方式和政策话语模式;二是以点带面,在一些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全球问题和国际感兴趣的中国议题上率先突破,逐步扩大国内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三是要建构一批国际合作的平台,培养一支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智库人才队伍;四是积极开展“二轨外交”和公共外交,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幕后推动中国外交的“助推器”。

(二)政府应为智库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新型智库建设除了智库本身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外,也需要从政府角度为其健康发展构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政府如何善用智库的角度而言,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国际竞争激烈、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再加上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信息量爆炸性增长,使得制定公共政策的成本和难度增加了,传统的拍脑袋决策和政府内部研究已经很难满足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需要。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今天,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大大增加,权力利益的博弈日趋复杂,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繁琐的过程,极大地考验着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能力。而智库作为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机构,其对全局性问题和公共政策相关方的利益考量相对比较周全,而决策的信息来源、思想来源和事实来源又决定着决策的质量和水平,因此有效发挥智库功能,将智库纳入地方政府的决策参考体系,将会大幅度地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平衡性和有效性。中国虽然倡导建立专家咨询制度,但无明确的法律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环节和程序,因此,应适当借鉴国外经验和做法,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德国在《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就明确规定,政府公共决策中的一切公开项目都必须公之于众,以招标形式委托咨询机构进行预测和评估,咨询结果由政府部门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能实施。

其次,在坚持国家利益、肩负时代担当的基础上,保障智库的独立研究空间。政府决策往往具有一定的政策惯性,路径依赖,甚至部门利益。由于智库处于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可能会与政府原定的政策方向存在差异,如何在科学比较的基础上,有效吸收智库的合理建议,不仅对于科学决策关系重大,而且还会对智库的发展形成外部导向。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积极鼓励智库专家更多地开展独立研究,提供第三方的中立建议,这不仅有助于政府通过不同智库政策方案的比对中实现“兼听则明”,优化原有政策的目标,而且也确保了智库的独立研究空间。

再次,要创造条件,为智库的咨询建言创造一

定的渠道。西方智库的决策咨询有一定的法律保障和渠道保障。例如,美国智库专家会经常参加国会各种委员会听证,提供自己的决策建议和意见。又如,国际知名智库还往往受政府委托,开展相关研究,或者为竞选期间或执政期间的总统提供各类执政思想和政策建议。目前,虽然中央越来越重视智库的意见和建议,经常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建言,两会期间,一些学术界的代表和委员也会提出相应的议案和提案,但是,由于我国没有相关法律保障,智库建言的渠道还是相对狭窄,一些地方重要智库领导甚至无法列席当地党委和政府的会议,不仅无法及时获悉党和政府的所思所虑,而且也难以在第一时间提交相关智库建议。为此,本文认为必须建立重大决策问询制度,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款对政府公共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进行严密、科学而理性的规范化设计,使智库咨询成为重大决策程序的必备环节,同时,要建立公共决策咨询招标和采纳制度,建立决策机构对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机制。

最后,要结合实际,善于整合利用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说到底,智库参与政府的政策决策,只是为政府部门提供可能的备选方案,最终政策如何制定,还是由政府来确定。因此,作为最终决策的政府官员,要具有整合各方建议,从中选出最优方案的能力。当然,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最优方案,领导人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只能是某时、某地、某局势下的相对理性的结果,这就更加考验决策者的科学决策能力,在条件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选择出最适合的政策方案。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有与智库方案相对接的行政执行能力。在政策方案研究中,智库学者往往会基于理想的状态考虑,提出一些超越地方政府执行能力的政策方案。作为地方官员,要具有良好的鉴别能力,千万不要好高骛远,贪大求洋,将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的方案采纳下来,最终出现决策失误。过去,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往往缘于地方政府领导的盲目决策,不经过科学论证就上项目,而在引入智库决策后,也存在智库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将在其他地方执行较好的政策或者方案盲目移植过来的情况,造成民主化决策离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决策相去甚远的情况。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行走的“读书梦”

——从“书香园区”看如何建设城市软实力

苏雁 王阳

读书,对民族的重要性无须赘言。近些年,苏州工业园区在激发全民阅读热情、营造“书香园区”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建设性颇多的创新之路。

想读书的时候,伸手就能够到

在园区多个邻里中心门口,都放着一排类似超市临时存包点的柜子。刚下班的李超,就从其中一个小柜子里取出了三本图书。

之前,李超在朋友的介绍下安装了一款名为“书香园区”的APP。注册之后,李超通过APP搜索到了自己想看的书籍,并提出了借阅请求。图书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找到书籍后,通过物流系统配送到读者指定的投递点。

除了网上借阅,闲暇时光里,读者在小区门口的咖啡厅、便利店、银行里,都能找到读书的地方。

原来,园区图书馆依托众筹的理念,与咖啡馆、酒店、银行、孵化器、便利店等社会公共空间,达成了“文化共享”共识,打造园区“阅读联盟”。“只要交2500元的押金,就可以从图书馆领走500册图书。”李春梅介绍,“这些书跟图书馆共通,随借随还,不收任何费用。通过这种资源众筹,社会闲置资源得到利用,以极低的成本在园区打造众多阅读点。”

分众阅读,总有一本好书适合你

在园区的新华书店里,市民李先生打开手机中的“书香园区”APP,查询发现最近出版的畅销书《荒野猎人》,图书馆还没有采购。经过店员查验情况、贴条形码、扫描等程序,不到一分钟,这本书就已经由园区图书馆购买,并且借给了李先生。

为了让读书更加个性化,园区打造了多种阅读空间。思客邦,就是针对园区外籍人士众多,所设立的特色阅览室。“我们与外籍人协会合作,定期组织阅读活动,把图书馆的外文阅览室真正利用起来。”图书馆工作人员冉鹏飞告诉记者,他们

正试图打造“个性化”阅读空间。“我们也会与中国基金博物馆等专业单位合作,配合需求开展共建,活跃特定群体的阅读与交流。”

“做服务,就是要掌握好数据,否则就很难有针对性。比如说,我们的悦读流通车进工厂服务项目,您可以猜到什么书受欢迎吗?”李春梅介绍,“我们根据借阅情况分析下来,是育儿类图书,占比达到近一半。那么我们下次再进工厂,就会多准备一些这类图书供读者挑选。”

海量信息,增强区域软实力

研发总监李勇,这些天辗转难眠。他的创业团队虽然手握千万启动资金,但对于自己的“智能穿戴”项目是否上马,李勇依旧难下决心。国内没有成熟的技术产品,寻找潜在合作伙伴成了难点之一。

李勇万般无奈,向独墅湖图书馆求助。在查阅了海量科技文献、新闻数据库等资料后,竟然发现国内外有近十个团队,至少完成了实验室阶段,有的已经在进行批量生产研究。根据资料,李勇迅速跟相关研究人员取得了联系,并与其中一家进展较快的研发团队,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事实上,独墅湖图书馆兼具科技文献信息服务机构的职能,在2007年就已成为“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苏州服务站”。图书馆利用海量信息,多次为园区甚至苏州范围内的政府和企业,提供科技创新创业、知识产权、产学研等方面的智力支持。

“营造书香园区,打造区域软实力,这些并不是图书的全部价值。海量图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可以助力企业创业创新,助推苏州园区扬帆远航。”夏芳说。

(作者系光明日报记者、光明日报通讯员)

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

连社联发〔2016〕5 号

第一条 为了使连云港市社联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全体常务委员会委员组成。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也可委托一名副主席召集并主持会议。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两次。必要时可以临时召集,也可以采用通讯形式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过三分之二的组成人员出席始得举行,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人数表决通过方为有效。采用通讯形式召开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其决议须得到全体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同意方为有效。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下列重要工作:

- 1.筹备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会议,向委员会报告工作;
- 2.实施委员会决议;
- 3.审议批准团体会员的接纳、退出或除名;
- 4.讨论决定其它重要事项。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主要议题,由主席会议研究确定。

第七条 市社联应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前五天,将会议时间、议题、议程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临时召集的会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八条 市社联机关部门负责人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应作记录,并根据需要编发会议纪要,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内设若干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由兼职副主席担任,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由常委担任。

第十一条 各专门委员会在常委会的领导下,按照市社联的工作安排,开展各专门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第十二条 各专门委员会定期向常委会汇报工作情况和提出建议。

第十三条 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6年2月26日

关于设立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七届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通知

连社联党发〔2016〕9 号

各县区社联，高校社联，市各社科类社会团体，各相关部门(单位)：

经中共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研究，并经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审议通过，在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内设立九个专门委员会。其具体名称及职责如下：

一、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其职责为指导社科界开展决策咨询工作，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科学论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学术与学会工作专门委员会。其职责为指导社科界开展社科研究、学术交流和抓好各社科类社团业务工作，围绕加强学术与学会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社科普及专门委员会。其职责为指导社科界开展社科普及工作，围绕促进社科普及事业发展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继续教育专门委员会。其职责为指导社科界开展社科继续教育工作，开展社科继续教育的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企事业单位管理创新专门委员会。其职

责为指导企事业单位推进管理创新，开展企事业单位管理创新工作的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青少年社科教育专门委员会。其职责为指导青少年社会科学教育工作，围绕青少年社会科学教育工作的政策、现状，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促进国际合作专门委员会。其职责为指导社科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工作，围绕国际合作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八、组织建设专门委员会。其职责为指导全市社联系统的组织建设，开展社联组织工作的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九、社科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其职责为指导社科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和维护合法权益工作，反映社科工作者的呼声和要求，开展有关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共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
2016 年 2 月 26 日

关于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七届委员会兼职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工作分工的通知

连社联党发〔2016〕10 号

各县区社联，高校社联，市各社科类社会团体，各相关部门(单位)：

经中共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研究，决定对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兼职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工作进行分工，具体分工如下：

兼职副主席王万军兼任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主任，常委陆瑞萍、高新禧兼任副主任；

兼职副主席孙巨传兼任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学术与学会工作专门委员会主任，常委赵鸣、高伟兼任副主任；

兼职副主席臧雷兼任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社科普及专门委员会主任，常委石荣伦、徐正华兼任副主任；

兼职副主席陈留生兼任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继续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常委杨雪英、李洪兵兼任副主任；

兼职副主席张克勤兼任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企事业单位管

理创新专门委员会主任，常委吴价宝、周一云兼任副主任；

兼职副主席徐爱玲兼任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青少年社科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常委王琳、周云利兼任副主任；

兼职副主席舒小平兼任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促进国际合作专门委员会主任，常委林振江、谢捌骏兼任副主任；

兼职副主席张淑萍兼任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组织建设专门委员会主任，常委张荣富、霍卫群兼任副主任；

兼职副主席朱伟哲兼任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社科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主任，常委孙宜志、黄忠德兼任副主任。

中共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

2016 年 2 月 29 日

《新研究》礼赞

——写在总 200 期刊发庆典时的回顾与展望

王统余

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新研究》正式创刊了，手捧散发油墨香气的新刊物，追思这本刊物的前身《研究》（后更名为《连云港论坛》）37 年走过的历程，不由得让与这份刊物共同奋斗多年的老编辑感慨万分。

《研究》是 1979 年创刊的，为适应当时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交流基层经验，荟萃理论精品，构筑理论阵地，鼓励探索争鸣的迫切追求，为全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垦荒出一个理论园地。刊物初创阶段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一无经费，二无专职办刊人员，三无编辑办公场所，但是在广大作者、读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下，硬是用简单的铅字印刷，无封面装帧，不定期出版 23 期刊物，针对当时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联系实际，研究论证，总结经验，探索争鸣，提供了理论阵地和平台，刊物既注重学术性强的理论研究文章的刊用，又重视具有操作性强的应用性文章的选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伴随着连云港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正如一个老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一次评刊会上说的，“这本刊物创刊于拨乱反正之初，繁荣于改革开放之时。”从 1986 年起，《研究》改刊名为《连云港论坛》，暂定为季刊，定期出版，由此开始，才有了为数不多的办刊经费，定编专职的办刊人员和有了办公用房，这份刊物从无固定栏目的来稿选登到栏目充分合理设置，内容不断充实调整，注重刊物封面设计和刊物印刷装帧，从关门办刊，内部赠阅到省内外直至全国期

刊协作，对外交流。经过多年努力，这份社科期刊被明确为市委市政府委托市社联主办的社会科学期刊，其间曾被评为全国地市级优秀社科期刊，荣获江苏省社科期刊优秀编辑奖和期刊装帧印刷奖，多次受到省社联的表彰。追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大潮，刊物也在逐年步步跟进，先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再由小十六开版本改为大十六开版本，在报道理论深入研究的同时，不断拓展报道形式，在栏目设置、合并、改造、出新的同时，还在板式变化的创意中，在刊载论文写作风格的生动和活跃中，力求给读者带来更加亲切和更为清新的气息。这份刊物围绕着市委市政府的思路，围绕着连云港市两个文明建设和各个阶段的实际问题，组织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深入实际，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建设献计，为繁荣连云港经济文化建设献策。这份刊物作为全市最早的综合性社科理论刊物的作用日益凸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理论品味和刊物形象，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

2016 年始，刊物更名为《新研究》，第一期刚刚创刊出版，第二期又迎来了总 200 期的庆典，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并一道送上我们的诚挚的祝愿。

愿《新研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联系与发展的观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运用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观点，找准刊物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撷取更为丰硕的果实，用放眼世界的目光，更加开放的姿态和革故鼎新的观念来研究连云港这个开放城市，为连云港的转型发展，发挥“一带一路”新型支点城市的作用而鼓与呼，坚守这块社科理论研究阵地和理论文

写在本刊出刊200 期之际

亲爱的读者：

当您拿到这本杂志时，意味着本刊已经出刊200期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创刊于1979年的连云港社科界内部刊物《新研究》（原《研究》，曾名《连云港论坛》）已度过了37个年华。值此出刊200期之际，本刊全体同仁谨向多年来支持、关心我们事业的领导、社科工作者及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37年，弹指一挥间。37年来，我们立足港城大地，研究连云港，宣传连云港，为连云港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我们的成长，与港城的改革发展休戚与共；我们的心灵，与广大社科工作者息息相通。长期以来我们积极发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作用。致力于将本刊打造成“鼓励争鸣探讨，荟萃理论精品，交流工作经验，促进社科繁荣”的阵地。

风华正茂，实力彰显，自创刊以来，本刊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内部类）、省社科系统刊

物印刷装帧设计奖和优秀编辑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0—2001年度优秀期刊、连云港市优秀内部出版物等诸多荣誉。200期的孜孜追求，铸就了《新研究》在港城这片热土上逐渐成为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品牌价值最高、影响力最强的第一社科类内部刊物地位。

一直以来，我们用不倦的思索，把脉港城的演进与嬗变，用无畏的勇气，坚守社科界的自强不息；我们靠理性和良知，为全市社会科学工作者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靠责任和担当，为市委、市政府提供社科咨询服务。

回望200期，我们有欢笑，有汗水；有辛酸，有收获。在坚守中，我们得到了读者的厚爱，也收获了前行的力量。

庆祝是为了纪念，纪念是为了创新。当今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我们依然会和您一起，怀着憧憬与梦想，行进在创造新辉煌的道路上。

本刊编辑部
2016年4月29日

化宣传阵地、普及社会科学理论的园地和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平台。在办刊过程中，贯彻中央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精神，最大限度的在刊物上反映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为不断提高我市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水平而扎实工作，辛勤劳动。“彩虹总在风雨后”，让刊物在繁荣社会科学的事业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发刊词中，编委会主任杨东升先生对《新研究》的办刊宗旨和定位，作出了清晰而具体的要求，标定了办出新风格、产生新思想、孕育新学派、迈入新境界的目标和思路，为办好《新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为实现这个定位和目标，任务十分光荣而艰巨且压力山大，但我们相信，有《研究》的最初创始者从无到有的拓

荒精神的鼓舞，有《连云港论坛》历届编辑人梯精神和积累的经验做基础，有明磊主编和周一云副主编的指导，有编辑部全体人员创新创业精神、拼搏进取和扎实工作，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和定位。到那时，条件成熟了，把《新研究》这份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向国家新闻出版局申请国家级社会科学杂志的正式刊号，面向全国和世界发行，就将最终实现立足连云港，走出江苏，辐射全国，面向世界这一办刊宗旨，这份刊物也必将迎来更加壮丽的历史新阶段。

愿《新研究》，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作者系市社联原秘书长）

社科大事记

2016年3月-4月

三月

(1)2日上午,2016年市委书记、市长圈定重大课题等全市应用研究课题资助项目选题讨论会在411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市社联党组书记、主席杨东升主持并介绍市委市政府建立全市决策咨询研究专项资金制度,设立全市应用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的情况。吴价宝、宣昌勇、王万军、朱伟哲、刘洪昌、马红等专家参加会议,对选题提出修改意见。

(2)2日下午,在411会议室召开市社联办公例会,杨东升分别与学会部、科普部、办公室负责人周一云、刘宏光、谢仁善首次签订2016年度部室目标责任书。

(3)4日,市科普宣传暨基地管理工作例会召开,各县(区、高校)社联和科普基地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市社联为抗日山烈士陵园等23家获批2015-2017年度的市级科普基地进行了授牌;学习了《连云港市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创建与管理实施办法》;下发了《连云港市第十三届社科普及宣传周实施方案》,从指导思想与总体要求、宣传主题和时间、宣传重点与工作安排等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市社联副主席明磊在会议总结中明确要求,各县区社联和科普基地在组织科普宣传周和各项经常性、群众性科普活动中,一定要有超前的谋划、落实的举措,强化宣传报道和监督考核,不断扩大科普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4)7日,市委组织部研究决定,增补周一云同志为市社联党组成员。

(5)11日上午,市社联在411会议室组织全体人员集中讨论《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草案),杨东升提出,市社联七届委员会五年任期与“十三五”规划时期重合,因此,本届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落实“十三五”规划。七届一次常委会和七届二次全委会对《规划》(草案)进行讨论并原则通过,本次会议是将大家提出的意见具体化和量化。

(6)14日上午,市社联党组会在330办公室召开,研究市社联发起成立市智库业协会的组织人事安排方案,拟设理事会理事50多人,常务理事15人,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组成。常务理事既有社科类智库负责人,又有科技类智库负责人;既有官方智库负责人,又有民间智库负责人;既有企业智库负责人,又有与智库有关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具有广泛代表性。

(7)16日,省社联在南京召开各市社科评奖工作会议。省社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出席会议并讲话,着重强调了完善全省社科评奖联动机制的必要性,介绍了完善全省社科评奖联动机制的具体措施,就进一步加强2016年省市社科评奖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并针对各市社科评奖的申报组织工作进行现场演示和交流。市社联副

主席明磊和评奖办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8)16日下午,由灌云县社联和灌云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学习党章党规 加强党性修养”专题报告会在县委党校二楼报告厅开讲,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周延胜教授讲课,来自全县宣传系统的近300名党员干部到场学习。

(9)17日,市社联副主席明磊一行两人赴宁波市社联学习考察,就课题研究、学会管理等情况进行了交流,宁波市社联副主席陈利权和科研管理处吴伟强处长介绍了相关情况。

(10)18日上午,省社科界第九届学术大会高层论坛在宁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省社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等领导与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作者代表以及学会代表约300人参加论坛。我市社联主席杨东升,秘书长周一云出席。

(11)18日下午,在南京钟山宾馆召开省社联八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和八届二次理事会,刘德海书记代表张异宾主席作工作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省社联八届理事会部分常务理事和理事确认调整的决定》,决定赵东荣不再担任秘书长,施蔚等7位不再担任常务理事,替补杨东升等9位为常务理事,替补增补黄永清等23位为理事,通过《关于同意接纳江苏省法学会为省社联团体会员的决定》。

(12)19日,赣榆区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举办了一场社科普及活动,江苏西德电梯有限公司180名员工参加。本次活动共分两大板块:一是以“熔炼团队精神”为主题的社科普及活动,二是以“挑战自我”为主题的素质拓展训练活动。

(13)28日下午,市委办通知,市委书记杨省世已圈定2016年度全市应用研究课题资助项目5项,即我市建设“一带一路”交汇点核心区和先导区的问题及对策,我市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深化上合组织国际物流园和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建设的重点与路径研究,我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问题研究,如何提高我市企业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问题研究。29日上午,接市政府办通知,市长项雪龙已圈定全市应用研究课

题5项。

(14)30日,淮海工学院社联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社联主席、党组书记杨东升出席大会并讲话。共170余代表参加了大会。

杨东升在讲话中对该校社联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充分肯定了该校的社科工作。杨主席指出,淮海工学院社联的成立,不仅为学校自身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构筑了新的平台、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学校与市社联及有关职能部门之间交流合作搭建了新的桥梁,拓展了新的空间。希望淮海工学院社联在今后的工作中,坚持正确导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坚持围绕中心,切实强化服务大局意识;坚持方法创新,大力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坚持协同发展,不断加强组织基础建设;为打造“连云港学派”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学校乃至全省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会议还听取了该校社联筹备领导小组的筹备工作报告,宣读并通过了《淮海工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章程》、《淮海工学院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选举办法》、《淮海工学院社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选举产生了该校社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淮海工学院党委书记赵炳起当选为主席,宁晓明、史顺良、舒小平、王洪法当选为副主席,徐启华、杨雪英当选为秘书长,马超当选为副秘书长。

(15)30日下午,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联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社联主席、党组书记杨东升,连云港师专党委书记滕士涛出席大会并讲话。市社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明磊,党组成员、秘书长周一云出席大会,1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还听取了该校社联筹备领导小组的筹备工作报告,宣读并审议通过了《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了该校社联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常务理事,连云港师专校长庞波当选为主席,张建华、陈留生、孙继才当选为副主席,李明高当选为秘书长。

(16)31日下午,在灌南县行政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全市一季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各县

区、市直宣传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汇报工作。杨东升汇报社联重点和亮点工作。滕雯常委对社联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筹备召开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成立大会提出了要求。

(17)下旬,市民俗学会承担的淮北盐民习俗、海州湾渔俗项目分别获省政府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扩展项目。市民俗学会多年来认真开展连云港盐民习俗、渔民习俗及山民习俗等方面的传承保护工作,去年与省民俗文化研究所合作对我市“三民”习俗进行专题调查,撰写编印了省级非遗项目申报书,申报省级非遗项目。

四月

(1)1日下午,在市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三楼会议室举行特约评论员聘请仪式,市电视台台长戴咏寒为我市首批电视评论员杨东升、林振江、吴价宝、古龙高、邹亚驰、蔡骥鸣、佟新宇、朱道荣、卢山、张悦秋、刘晓光、曹立志等12人颁发聘书。

(2)9日,连云港市社联会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单位,在朝阳街道群乐汇大舞台联合举行连云港中华孝文化节暨“孝传天下”线上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市政协副主席曹佳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浩、市社联主席、党组书记杨东升等出席,并参观了东海孝妇祠及三月三庙会。

此次活动以“孝传天下”为主题,计划通过微信平台开展全球性的“孝传天下”火炬传递活动,历经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香港、北京等世界及国内十几座城市,于2016年10月9日重阳节当天汇聚到港城,点亮盛大的中华孝文化节盛典晚会。同时,此次孝文化节将加入书画名家孝文化主题书画笔会、“孝心在港城、父母圆心愿”征集活动、评选全市十大孝星、开办电视专题栏目《非遗影像》、举办中华孝文化与连云港旅游养老产业发展高端论坛、《窦娥冤》原型及舞台剧《东海孝妇》研讨会等各类活动,全面释放“连云港·中华孝文化节”影响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9日,连云港市杂文学会赣榆分会创作基地挂牌仪式在赣榆区智贤中学砺儒楼会议室举

行,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市杂文学会名誉会长、连云港日报社原总编刘畅征,市杂文学会会长李正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卢同根,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兼赣榆区杂文学会会长周裕本出席了会议。市杂文学会赣榆分会的会员近二十人参加了会议。

(4)11日,连云港社联与天津、青岛、宁波、厦门、宝鸡等城市社联共同发起,正式向全国40多家“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社联发出《关于参加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成立大会暨“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的邀请函》,邀请沿线重要节点城市来连参加首届中国城市智库联盟大会。

(5)13日上午,召开市社联党组会,专题研究市社联筹备召开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成立大会暨“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的各项工作,原则确定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日程、征文评奖、邀请领导专家、编印论文集、申请经费等事项。

(6)14日,在330办公室杨东升与市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潘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潘珊珊专题研究确定市社联与市报告文学学会共同创办《连云港纪实》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并明确了刊物的办刊宗旨为传播真声音、传送新感觉、传递正能量。

(7)15月至18日,为学习发达或先进地区社联的先进经验、交流新型智库建设、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成立大会暨“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等事宜,市社联党组书记、主席杨东升带领机关部分干部到天津、唐山等城市社联学习考察。天津市社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靳方华,副巡视员、市学会党工委书记张同顺,科研处主任杨向阳,科普部主任华敏,办公室副主任李景华,信息处博士肖雅楠,学会处干部兰云等,唐山市社联党组书记、主席王力,副主席陈伟,副调研员王素敏等重点就本市近年来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亮点工作特别是新型智库建设的经验进行了交流。

(8)19日,市社联党组书记、主席杨东升等一行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联系工作。该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陈国平,副所

长、研究员邹治波,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薛力,副研究员马涛,科研处干部郝艳菊等同志参加洽谈。

此行就拟在连云港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一带一路’(连云港)研究基地”事宜与该所相关领导进行洽谈商榷,已达成初步共识,后期将进一步对接。此行还专门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赵剑英、重大项目出版中心编辑孙萍博士,并参观了社史馆和重点出版物展览室。

(9)20日,世界读书日和江苏全民阅读日前夕,海州区社联携手连云港书店,向板浦镇东辛村捐赠了1229本图书。本次赠书活动,是区社联响应省市社联普及便民阅读号召,发挥科普职能的又一实际举措。按照“联送一批、编送一批、推荐一批”的工作思路,区社联积极组织相关专家开展科普读物编纂工作。

(10)22日上午,在连云区明珠开君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室举办连云港市社科界首届学术大会保险学会专场,由市社联举办的2016年连云港市社科界首届学术大会活动拉开帷幕。学术大会以“树立新理念、建设新港城”为主题,各县区、高校社联,市直属有关学会、研究会、研究机构等单位将承办多场高规格的各类学术活动。

学术大会活动是由市社联首次主办的引领学术研究、展示成果、培养人才、促进繁荣的重要社科学术交流活动,是社科界为加快建设社科强市,努力做好建设富庶文明幸福新港城的“最强大脑”,不断登高原、攀高峰,为连云港学术注入丰沛的思想气韵的重要举措。首届学术大会从4月份开始启动到9月底结束。活动期间,主办方将推出“中青年学者论坛”、“高层发展论坛”等多个品牌学术活动,设立社科界主会场、高校专场、学会专场和县区专场。学术大会将征集发布最新最前沿的学术成果,评奖优秀成果,邀请多位省内外知名专家、论文作者进行了学术演讲和交流发言。一年一度的学术大会将成为我市社科界众多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热情期盼的一场学术盛宴。

(11)22日,市社联印发《关于申报2016年度市委书记市长圈定重大课题等全市应用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的通知》,这是市社联首次开展市委书记市长圈题和市委常委及重点部门负责人命题的应用研究资助项目。

(12)23-28日,市社联主席杨东升、副主席明磊在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参加全市高层次宣传文化人才研修班。

(13)26日,广东中山市社联主席胡波,副主席周萍一行10人来我市学习考察市场监管和信用体系建设等工作,市社联党组成员、秘书长周一云等介绍我市情况。

(14)27日,连云港市社联举办全市学术类社会团体秘书长培训班。全市各学会、协会、研究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部分高校社联秘书长参加。

培训班上,学习了有关文件和规章制度,就今年全市学会、科普、科研和评奖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处王爱民处长就社团信息资料登记换证、三证合一、一证一码、年检等业务工作进行培训辅导。

市经济学会、保险学会、读书研究会、胸海书院四家社团,交流了2015年工作的做法、经验以及2016年工作打算。参训者围绕课题申报、学术大会、社科书籍期刊编辑、人才队伍建设、分支机构管理、对外交流工作、党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15)29日,市社联杨东升等申报的2016年度省委书记、省长圈定的省社联、省社科规划办双立项课题《提升东陇海经济带发展水平研究》获批立项与省政府研究室共同承担。